

# 西班牙内战的安那祺主义教训



赵京 编著

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文库 S-1



中日美  
日米中

比较政策研究所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出版: Lulu Enterprises, 860 Aviation Parkway, Morriville, NC  
27560 USA

发行: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http://cpri.tripod.com>

262 Altadena Cir. Bay Point, CA 94565 USA

[zhao.cpri@gmail.com](mailto:zhao.cpri@gmail.com)

第五版, 2015年1月25日

字数: 38千

ISBN 国际书号: 978-0-557-17055-5



# 目 录

## 前言

### 一、研究（赵京著）

1. 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的政治实践：卡莎维哈斯惨案
2. 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实践
3. 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从西班牙内战悲剧中的教训
4. 西班牙安那祺运动的历史经验

### 二、文献

1.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纲领
2. 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纲领

### 三、乔治·奥威尔著《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摘录）

## 前言

中文世界对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奋斗的了解至今还主要来自巴金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就收有：

[1] 西班牙的斗争（若克尔）（1937年10月旧金山平社初版，1939年4月上海平明书店改订五版）；

[2] 战士杜鲁底（1938年8月上海平明书店初版）：布埃那文士拉·杜鲁底的生平（H. 吕狄格尔），纪念杜鲁底同志（F. 孟蔡尼），杜鲁底并没有死（爱玛·高德曼），我和杜鲁底的第一次会见（奥古斯丁·苏席），杜鲁底纵队（卡尔·爱因斯坦）；



[3] 西班牙（苏席）（1939年4月上海平明书店出版），西班牙进入一九三八年，加米洛·柏尔奈利；

[4] 一个国际志愿兵的日记（米宁）（1939年4月上海平明书店出版），附录 送别国际队的志愿兵（F. 孟蔡尼）；

[5] 西班牙的日记（1939年4月上海平明书店出版），加尔洛·罗塞利，西班牙的日记；

[6] 巴塞罗那的五月事变（罗塞利）（1939年4月上海平明书店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之后版《巴金全集》第17卷还有“《西班牙在前进中》后记”、“《西班牙的血》序”等。

中国著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王凡西翻译了斐列克斯·莫罗著《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其中介绍安那祺主义的传奇英雄杜鲁底

对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的记者发表的一篇有名谈话，代表了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运动的心声，值得引用：“对我们说来，这是要一劳永逸地扑灭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是这样的，不管我们这里还有政府存在。”

“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誓死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当资产阶级看见权力从它的掌握中溜走时，它得向法西斯主义求救来维持自己。西班牙的自由派政府本来很久以前就可以将法西斯分子的力量削除的。他们不此之图，却踌躇不前，调和妥协，浪掷时间。甚至在目前，在目前这个政府中，也还有人想同叛军客客气气，不要严厉对待。你可别叫表面的现象给欺骗了，你知道——你笑了起来——我们现在的政府也许会需要这些叛军来扑灭工人运动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目前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苏联，这对我们说来并无意义——为了这个国家的和平与安静，斯大林却将德国和中国的工人当作牺牲，奉献给法西斯的野蛮统治。我们要在此地，在西班牙干革命，而且现在立即就干，不要延迟到下次欧战之后。我们用我们的革命所给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烦恼，比俄国整个红军能给他们的烦恼更甚。我们给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做了一个榜样：该如何去对付法西斯主义。”“我不期待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革命会从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获得援助。各个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也许会对我们的斗争发生某种影响。这是很可能的。佛朗可正在尽其所能把欧洲拖入冲突中。他会毫不迟疑地教德国来反对我们。但是我们不期望什么援助，最后分析起来，我们甚至不期望我们自己的政府给我们帮助。”

第一部分收入的四文，在不同时期写成，内容有少许重叠，反映了我对相同关注的思考程度。另有一篇相关文章“第一国际在西班牙创立的公案—兼论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因为与第一国际关系更深，被编入《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第四版，2014年12月27日，ISBN:978-0-557-01635-8）。

## 第二部分的文献引自

<http://bbs.bhsf.cn/disppbbs.asp?boardID=57&ID=3807&page=1>。其中有说明：“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是重要的历史事件，我国对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文献译介较少，且多站在当时共产国际以及西班牙共产党的立场上，而西班牙内战中的另一重要角色——西班牙左翼工人政党的宣言、分析、传单等文献难以见到。为了更好理解西班牙内战的历史，现将两篇文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纲领》和《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纲领》译出，译文依据《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杂志第1卷第2期（1988年出版）发表的英译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当时西班牙较有力量的政党。……注释均为中译者注”。2007年2月1日。

第三部分需要略加说明：奥威尔偶然加入反对西班牙共产党的POUM(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on Marxista马克思主义联合党)组织的民兵，被派到安那祺主义民兵战斗的阿拉贡战线。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文译者李华，刘锦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引自<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homeagetocatalonia.htm>。原译作为报告文学文笔流畅，值得推荐。摘录主要为关于安那祺主义的部分。校注根据Orwell in Spain. Ed. Peter Davison, Penguin Books, 2001，与原译文所用的版本不同，在一些政治用语、意义和重要的意思表述上改动较多。我同时简略参照由Lionel Trilling作序的1952年New York的Harcourt, Brace & World公司出版的版本。这个版本更强调“共产党的出卖”。由于无法联系到原译者，担心存在“版权”的分歧，可能会进一步改译。

赵京，2015年1月25日

## 1. 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的政治实践：卡莎维哈斯惨案

2004 至 05 年期间，我受邀为西班牙当代史协会编辑关于中国当代史的专集，与 Revista de Historia Actual（当代历史评述）在西班牙 Cadiz 大学的编辑们有一些交流。其中负责网上出版技术的 Rafael Gomez 非常纳闷为什么西方的民主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容忍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将军终身统治西班牙直到 1975 年 11 月 20 日死亡。对我来说，这是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与日本的天皇一样，佛朗哥看透西方“民主”阵营战后需要他铁腕统治西班牙以对抗他的宿敌苏联。正如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样，佛朗哥获得德、意法西斯的军援，但共和国却从英法那里得到“不干涉内政”的保证。1976 年，佛朗哥的残党在得到“不追究犯罪责任”的保证下还政于民，也算是聪明识时务，被亨廷顿声称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开始。

Cadiz 位于西班牙的西南海岸，面对大西洋，邻近摩洛哥，在内战爆发（从 1936 年 7 月 17 日）时属于叛乱地域。离 Cadiz 约 100 公里以北的内陆城市 Seville 在内战爆发时也属于叛乱地区。在 Cadiz 和 Seville 之间的山区，有一个叫 Casas Viejas（卡莎维哈斯）的小村庄，在这里发生了安那祺主义运动史上著名的“卡莎维哈斯屠杀”事件。Rafael 告诉我，他奶奶就住在卡莎维哈斯。

西班牙安那祺主义的根源来自于对天主教和王权的残酷支配历史的反抗，当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激励起民众的共和理想时，拿破仑的刺刀却架在西班牙民众的头上。这也是西班牙产生了最早（在蒲鲁东等作出理论总结之前）、伟大的安那祺主义艺术家 Goya y Lucientes (1746-1828) 的原因（插图为其著名的油画 The Third of May, 1808）。西班牙是安那祺主义发展成一种主要政



治运动的惟一国家<sup>1</sup>，而卡莎维哈斯被广泛认为是安那祺主义运动乡村起义的典型。自 20 世纪初安那祺主义哲学在欧洲传播并在其边缘地区（俄罗斯和西班牙）发展成长，那些刚刚形成的大都市中的“无产阶级”穷人阶层最容易受到安那祺主义的激励，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被初步组织起来的工会自然成为安那祺主义的主要力量。1933 年，刚成为共和体制的西班牙仍然处于专制势力（特别是军队）的威胁之下，另一方面，刚踏上政治舞台的都市劳工和村镇民众又不可忍耐地诉诸政治手段要求改善经济待遇。1 月 8 日巴塞罗那、马德里和 Valencia 等地的安那祺主义者在匆忙之中响应传闻中的铁道工人罢工而起义，认为可以一举摧毁旧制度，遭到政府的轻易击破，但在卡莎维哈斯，受安那祺主义影响的村民却于三天后袭击警察局，宣布实现自由共产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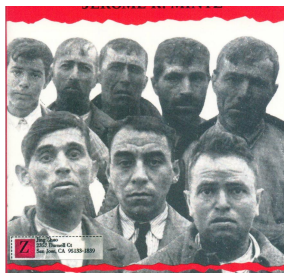
此时，以 Azana 首相为首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并不能有效地控制社会，对于各地的来自专制势力和自由共和/安那祺主义的反叛，只能下令镇压，却随各地的警察和军队按其意愿执行。当卡莎维哈斯暴动的消息传到城里，一个中士奉命带着十二名警察先被派来赶到村边。三个小时以后，一个中尉奉命带着十二名士兵和四名警察前来增援镇压。此中尉头一天刚到任，对于本地怀着恐惧不安，本能地感到每一家村民都是叛乱分子。军队和警察们最终在一个烧炭的茅房处遇到武装抵抗，他向省长要求进一步声援，晚上十点时，省长的特使与两名带着手榴弹、来福枪和一挺机枪的下士也赶到了。天色已晚，中尉不想无谓地伤亡，准备第二天天明之后再进攻。此时，另一队载有四十名士兵的车队赶到，这支由一个上尉指挥的军队在出发前一天刚从马德里被调到一个叫 Jerez 的小城去镇压那里的安那祺主义抗议活动，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有睡眠了，上尉曾拒绝来自内务部长的电话命



---

<sup>1</sup>安那祺主义成为重要政治运动，特别是军事斗争的另一个地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乌克兰。参见赵京《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2011 年，ISBN:978-1-4583-0411-7。





令，但被迫带着士兵赶夜路到卡莎维哈斯去平息紧急状况。这些疲惫不堪的士兵原准备与成百上千的武装安那祺主义者战斗，现在看到面前的敌人只是躲藏在茅房里的男女老少，杀戒大开，不等天明，立即放火烧燃茅房，并射杀往外逃命的八个安那祺主义者（右插图）。丧失理智的士兵们又报复整个村庄，射杀了另外十二个村民（左插图部分殉难者），酿造了震惊全西班牙的“卡莎维哈斯惨案”。

与几乎所有的政府犯下的罪行一样，随之而来的是由受到袭击的乡镇警察和参与镇压的政府官兵对每一户村民的审判，不少村民逃离了卡莎维哈斯，留下的人要忍受此后数十年的敌意和仇视，这是西班牙 Andalusia（安达路西亚）地域无地民工愤怒和牺牲的象征。后来，惨案的真相部分地被揭露出来，相关的官员都推卸责任，说自己没有下命令屠杀，最终导致 Azana 政府的辞职。这个惨案加剧了专制势力推翻共和体制的决心，佛朗哥在叛乱的第二天的广播声明中就声称西班牙被安那祺主义和革命罢工摧毁了。在一九七三年至七四年制作放映的《大丈夫佛朗哥》电影中，就描述卡莎维哈斯起义是促使佛朗哥反叛共和国的决定因素之一。可怜的安达路西亚贫苦民众，你们在共和体制下尚不能得到公正，又如何能在专制独裁（教会加军警）下苟活生存？怪不得那些在佛朗哥死后采访该地的外国人都发现：安达路西亚山民最会撒谎，因为撒谎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本能了。

卡莎维哈斯见证了安那祺主义运动的真髓：希望、叛乱、失败；再希望、再叛乱、再失败……而在这一系列看似循环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制度、人类的文明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的共和体制在西班牙已经稳固，就是因为西班牙经历了卡莎维哈斯惨案、西班牙内战，特别是佛朗哥独裁反动时期。

如果说安那祺主义政治实践与别的政治力量（包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多数派别）有什么重要区别的话，那就是：安那祺主义为了改进

社会，常常不回避明显的政治失败。正如西班牙内战的参与者舒奇回顾到：我们这些安那祺主义者遭受各种政府权力的迫害，一生都处于监禁、流放之中，好像一事无成。但是，我们欣慰地看到，许多我们为之奋斗、牺牲的理想，已经被写入联合国宪章和许多国度的宪法条文中，政府的权力进一步被制约。在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中，随处可见安那祺主义理想里闪耀着芝加哥干草市场、墨西哥萨巴提斯塔、俄罗斯克朗斯达特以及西班牙卡莎维哈斯殉道烈士们的光芒。

此文主要参照 Jerome Mintz, *The Anarchists of Casas Vieja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也从 Helen Graham, *The Spanish Civil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和 Robert Graham, *Anarch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 Vol. 1. Black Rose Books, 2005 中得到一些知识。

[2007年1月1日 美国圣拉蒙]

## 2. 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实践

虽然安那祺主义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地域，但只有在西班牙才成为真正的大众社会运动。在 1936-1939 年的西班牙内战中，安那祺主义又作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提供了作为实践的安那祺主义的经验和教训。

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起源于 1868 年巴枯宁派遣来的使徒。与俄罗斯类似，西班牙处于欧洲文明的边缘，遭受国王之下天主教会和军阀、警察、匪徒联合体的统治。在 1873 年的 Cordova 议会后，国王 Amadeo 放弃王位并逃离西班牙。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西班牙于 6 月 1 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并选出 Pi y Margall 成为总统。出身中下层的 Margall 深受蒲鲁东的影响，著书质疑权力的来源：“任何对别人行使权力的人都是暴徒”，“真正的秩序不能靠强制获得”。虽然 Margall 在从政过程中修正了他的安那祺主义观点，“至今任然被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视为圣者”<sup>2</sup>。Margall 的共和政府很快瓦解，但联邦/联盟 federal 和共和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在 1936 年，拥有百万成员的西班牙最有影响的工会 CNT (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 也只有一个专职的书记领薪水。

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两个地域最成功扎根民众：最贫困的安达路西亚 Andalusia 山区<sup>3</sup>和最工业化的卡塔罗尼亚 Catalonia (以西班牙最大的城市巴塞罗那为中心，在内战之前成为自治体，有“总统”)。CNT 和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联盟 FAI (Iberian Anarchist

---

<sup>2</sup>引自 Gerald Brenan, *Anarchism in Spain*.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第 371 页。这一段历史简介多来自此书。

<sup>3</sup>见笔者前文“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的政治实践：卡莎维哈斯惨案”，比较政策评论第 11 期 2007 年。

Federation) 的成员多数也来自安达路西亚<sup>4</sup>。1931 年西班牙再度宣布共和, 经过几度选举变更后, 社会主义派、共产主义派、自由主义派和一些地方主义派加上安那祺主义 (CNT-FAI)、托洛茨基派 (POUM) 和一般共和主义派的支持, 组成的联合阵线在 1936 年以 34% 比 33% 战胜执政联盟<sup>5</sup>, 旧势力在共和西班牙内已经无法靠普选回复失去的政权。经过一系列小规模暴力事件后, 在摩洛哥殖民地等处的军队开始发动叛乱, 引发了内战。

西班牙内战以法西斯势力得胜告终并使西班牙处于佛朗哥将军的专制统治下四十年。独裁者佛朗哥死后, 恢复共和的西班牙不得不妥协, 保证不追究佛朗哥党徒的罪行。所以, 对内战的研究在西班牙本身就不充分<sup>6</sup>, 更不用提在西班牙语之外的世界了。在英语世界里, 在哈佛大学任哲学教授的 Santayana 可谓是西班牙最出名的知识分子<sup>7</sup>, 但他的保守主义支持佛朗哥 (同时也追随美、英的“反共”外交政策), 由此可以想象对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研究的贫乏。除了舒奇等安那祺主义参与者的相关回顾<sup>8</sup>外, 原共产国际的奥地利成员 Borkenau 的《西班牙座舱》<sup>9</sup>和著名自由主义作家奥威尔的《向卡塔

---

<sup>4</sup>例如, 1882 年在 Seville 召开的安那祺地域联盟会议, 代表的近 5 万成员中, 有 3 万来自安达路西亚, 1 万 3 千来自卡塔罗尼亚。引自 Gerald Brenan, *Anarchism in Spain*.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第 382 页注 13。

<sup>5</sup> [http://en.wikipedia.org/wiki/Spanish\\_Civil\\_War](http://en.wikipedia.org/wiki/Spanish_Civil_War)。

<sup>6</sup>许多内战后逃到墨西哥等西班牙语国度的共和派人士发表或出版了不少回顾, 他们多少促进了南美学术圈的激进化。曾在墨西哥大学留学的 Hobbs 律师告诉我, 他的人文科教授们几乎都是马克思信徒。

<sup>7</sup>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santayana/>。他虽然只在西班牙生活 8 年 (另 80 年在波士顿和罗马), 却一直保持西班牙的国籍。

<sup>8</sup>见笔者“一个安那祺主义者对自由的终生追求与思考”, 比较政策评论第 7 期 2003 年 <http://cpri.tripod.com/cpr2003/souchy.html>。收入本文库赵京《德意志观念对安那祺主义的贡献》, ISBN: 978-1-257-37771-8。

<sup>9</sup> Franz Borkenau, *The Spanish Cockpit*. Marshall Shatz ed.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Des Plaines, Ill: Bantam Books, 1971.

罗尼亚致敬》<sup>10</sup>有亲身的记述。Borkenau 后来成为反共知识分子，但这并不减少他 1937 年就出版的报道的价值，其中涉及许多安那祺主义实践的难题。

一、“1936 年 8 月 5 日晚 11 点，巴塞罗那：除了中央大教堂 Cathedral，所有的教会都被烧毁了。那些教堂的墙还没有垮，但内部已经被完全毁掉了。有一些教会还在燃烧。交通中心附近的意大利蒸汽船公司的大楼也被烧毁了，据说因为有人从那里放冷枪。不过，除此之外，并没有纵火。刚击败军事叛乱时，有人借安那祺之名抢劫，也有旧军人在烧毁教堂时盗走财物。CNT 立即发布公告，这在各建筑物墙上随处可见，对抢劫者现场格杀勿论。实际上，安那祺主义者对于所有教堂财物，包括银行支票，都统统付之火炬，比一般共和主义者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清白。在回旅馆的路上，我看到一个教会的烧毁，非常吃惊。我先以为是一帮为非作歹之徒所为，其实是执行公务。火焰迅猛，有一小批人在旁观看，既不惋惜也没有兴奋。消防队的人也在场，防止火焰延到附近的建筑物，也防止有人进入教会。人们对此都变得麻木、顺从了。”<sup>11</sup>



这个安那祺主义与教会关系的目击记实，发生在西班牙刚废除王制的几年内，实际上把教会完全推向叛乱的佛朗哥一边，成为共和政府垮台的致命因素之一（插图为共和主义者向耶稣塑像开火）。而包括梵蒂冈在内的天主教会对于佛朗哥支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佛朗哥战胜后把西班牙的教育权给教会。西班牙（包括今天的葡萄牙）教会在十

---

<sup>10</sup> George Orwell, *Homage to Catalonia*, London, 1938.

<sup>11</sup> Franz Borkenau, *The Spanish Cockpit*. Marshall Shatz ed.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Des Plaines, Ill: Bantam Books, 1971. 第 493-494 页。

一、十二世纪以来以修道院朝拜起家，积累了大量财富<sup>12</sup>，与王权结合，实施“异端裁判”等等，罪行深重，对其惩罚是不可回避的，但烧毁教堂是不可取的。巴黎公社把教堂开放给社区公用，列宁也没有烧毁教堂，而是没收其财物拿到国际市场上去换取急需的食物、药品等。实际上，以安达路西亚山民为主的广大安那祺主义拥护者，在心灵深处，同时埋藏着对代表公正的千年王国的盼望，烧毁教堂的不文明行为，把多数没有文化的山民也推向叛乱势力。

这使我联想到 2004 年 11 月，年过八旬的墨西哥南部的贫穷省恰巴斯 Chiapas 原主教 Ruiz 访问加州，我们参与接待了他，与他有过短暂的交谈。他在主教任职期间获得原住民信任，调解萨巴蒂斯塔民族解放军与墨西哥政府之间的谈判，被认为“偏向”原住民<sup>13</sup>。墨西哥政府连续三年迫使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放弃授奖给 Ruiz，声称那对墨西哥是耻辱的，并威胁如果 Ruiz 获奖，将撤毁对原住民的承诺。我从他身上感受到西班牙语世界中天主教的不可替代的功能。<sup>14</sup>

二、“8 月 6 日：到处是代表各政党和工会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为什么没有（如 1934 年的奥地利那样）由各工厂直接选出的苏维埃呢？CNT 有能力决定是否建立苏维埃，如果 CNT 愿意，社会主义党 UGT 等无法阻止。我意识到 CNT 已经通过强大的工会组织控制了工厂，如果举行苏维埃选举，只会让别的政党也到工厂去（试图）分享

---

<sup>12</sup>其修道院或教会的艺术建筑本身也是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例如最广泛使用的英文教材 Marilyn Stokstad, *Art History*,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95 第 523、526 页。

<sup>13</sup>参见笔者译文“战争状态下的恰巴斯”，《十月评论》1998 年第 4 期。  
<http://cpri.tripod.com/cpr1998/chiapas.html>。收入赵京《美国政治的安那祺主义传统》，ISBN: 978-1-257-43927-0。

<sup>14</sup>我 2004 年圣诞节期间访问墨西哥城，也感受到民众对宗教的盲目崇拜。见我的“墨西哥之旅随感”<http://cpri.tripod.com/cpr2004/mexico.pdf>。

力量。其实，在俄罗斯，共产党人在通过政党掌握权力后也对苏维埃不感兴趣了。”<sup>15</sup>

“8月8日：安那祺分子的暴力不限于它的敌人，昨天它也攻击POUM（托洛茨基派）。当POUM的军事组织带枪召开一个常规的会议时，武装的安那祺主义者乘卡车赶到，在会场门口架上机枪，解除了POUM的武装，宣布在此地没有必要让POUM从军事上威胁CNT的支配地位。POUM向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sup>16</sup>

不过，在军事这个权力行使的实质问题上，很难只责难安那祺主义者。实际上，由于苏联是共和政府的唯一实力支持国（提供包括飞机等重武器），到处都流传着“俄国人做主”的说法。俄国人顾问不到两千，但控制重要的位置（例如巴塞罗那电台、武器生产部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通过NKVD（苏联秘密警察）先把托洛茨基派赶出去，再下一步，在12月12日的《真理报》宣称：“在卡塔罗尼亚，清除托洛茨基分子和安那祺分子的行动已经开始，并将以在苏联同样的能量展开。”更可悲的是，当西班牙社会主义党头目自以为是“西班牙的列宁”时，俄国人认为他们不如外国去的共产党人可靠，由这些不懂西班牙语、秘密行事的苏联警察（其头目、驻西班牙大使Rosenberg本人其实也不被莫斯科信任）操纵的共和联合政府，怎么可能与西班牙职业军队作战？

此外，如何组织军队，也对安那祺主义提出挑战。佛朗哥发动叛乱的一个原因就是共和政府宣布废除常备军，断送了佛朗哥及其

---

<sup>15</sup> Franz Borkenau, *The Spanish Cockpit*. Marshall Shatz ed.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Des Plaines, Ill: Bantam Books, 1971. 第497-498页。

<sup>16</sup> Franz Borkenau, *The Spanish Cockpit*. Marshall Shatz ed.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Des Plaines, Ill: Bantam Books, 1971. 第508页。

手下的职业军人的前途<sup>17</sup>。面对这样的职业军事叛乱集团，共和政府在是否创建职业军队以及由谁指挥的问题上争执不休。

回顾起来，西班牙内战爆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西斯势力的德国、意大利马上支援佛郎哥（插图为毕加索著名的德国1937年轰炸格尔尼卡壁画），但英、法等“自由民主主义”国



度则采取“不干涉”的观望态度（法国的社会党政府在最初曾支持过但很快放弃了），而支持共和政府的苏联（以及墨西哥）力量不足，又带有狭隘的“保卫苏联”的政治意图瞎指挥。与巴黎公社的命运一样，西班牙共和的命运也难以有不同的结果。除了共和政府内部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不合作（未能建立广泛的苏维埃式联盟），社会主义组织与资产阶级共和政党之间的对立（未能组建有效的军队等），暴力销毁教会等教训外，还有不成熟的实验（如农业合作化、废除货币的交换等）。尽管如此，短暂生存的战时共和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也取得巨大成就<sup>18</sup>。兴许，共和西班牙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法制改革试验，正如安那祺主义者法务部长 Oliver 在 1937 年 1 月 3 日演讲的那样：“我们不是要废除法案和律师，但事实上律师太多了。当人们之间的关系正常时，没有偷窃和杀伤的必要。在西班牙的历史上，让我们首次宣布：一般违法者不是社会的敌人，他更是社会的受

---

<sup>17</sup> 1973-74 年在西班牙制作的电影《大丈夫佛朗哥》也是这样讲的。其中也提到卡莎维哈斯惨案作为职业军官们叛乱的理由。

<sup>18</sup> 例如，1931 年全西班牙只有 3 万 7 千名教师，但 1937 年新开了近千所学校，在共和西班牙就有 6 万名教师。1937 年，天花等疾病的预防注射在共和西班牙也得到全面推行。见 Hugh Thomas, *Anarchist Labor Federation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第 518-519 页。



害者。” “法律是如此敏感的事务，我们只能用人的心去解释它。”

19

这就是安那祺主义的精髓：社会秩序只能建立在自由意志遵守、接受的基础上。与所有安那祺主义运动一样，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实践也由于主客观、国内外的因素没法达成这一理想，更悲烈地演示了希望、崛起、抗争、失败、绝望、再希望的过程。罗莎·卢森堡在近一个世纪前对“如果社会主义错了，欧洲不需要社会主义”的疑问，回答道：“那就意味着野蛮倒退。”现在，我们同样面临着文明还是野蛮的选择。在“全球化”的今天，当腐败的国家权力与欺诈的跨国界资本勾结，支配全球时，也只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制约，在全球范围内才有可能实现安那祺主义的理想。

[2008年9月28日 美国圣拉蒙]

---

<sup>19</sup>Hugh Thomas, *Anarchist Labor Federation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第520页。

### 3. 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从西班牙内战悲剧中的教训

在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的历史实践中，1971年巴黎公社的悲剧是主要受安那祺主义影响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体雏形在外来（普鲁士）军事力量的压力下被资产阶级“共和”派（主要特征是由“普选”产生的政府）镇压的历史<sup>20</sup>，半个世纪后马赫诺运动和喀琅施塔得起义是主要受安那祺主义影响的俄国革命的精髓对于正在形成的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的反抗<sup>21</sup>，而持续了将近3年（1936年7月17日—1939年4月1日）的西班牙内战则是安那祺主义运动在与资产阶级共和派、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和新起的共产党又合作又被出卖（内战中的内战）的过程中，被以佛朗哥为首的旧军队、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天主教会和保皇党势力联合的血腥法西斯军事独裁击败和报复的悲剧。

关于西班牙内战，当时就有大量各种媒体文献出现，有一千多位记者从世界各国赶去报道战事，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等正义人士直接到西班牙参加来自五十多国有四、五万之众的“国际纵队”（插图为1937年阿拉贡Belchite战役中的国际纵队坦克）



<sup>22</sup>，他们写出的文学作品《战地钟声》、社会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等脍炙人口。法国作家阿伯特·卡缪、智利诗人（当时任驻西班牙

---

<sup>20</sup> 赵京，“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2010年11月。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paris.pdf>。

<sup>21</sup> 赵京，《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ISBN:978-1-4583-0411-7，2011年1月。

<sup>22</sup>国际纵队虽然被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共产党控制，但绝大多数战士们，都是自发自愿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人类前途的正义事业，属于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理想主义者。

牙大使) 聂鲁达等的作品也震撼人心, 最著名的当然是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的控诉德国法西斯轰炸不设防的巴斯克城市的大型壁画《格尔尼卡》。在佛朗哥死后, 西班牙虽然政治上妥协不对残留的法西斯势力清算, 但对内战研究解禁, 受害者们纷纷站出来控诉, 埋藏了几十年的大量史料(包括屠杀场所)暴露在公众面前, 震撼了国际社会。除了西班牙语、加泰罗语, 英文、法文等资料也层出不穷。每一本试图全面描写西班牙内战的书都必须用专门一章的篇幅来讲资料来源, 特别要提及新的研究发现, 同时也不得不对既有的文献进行评判。不用说, 这是西班牙内战在新的形式(历史记叙)下的继续展开。<sup>23</sup>

在中文世界里, 除了我已经发表的两篇论文, 巴金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译文依然是最有价值的文献<sup>24</sup>。虽然在近三年的悲壮斗争中, 有许多珍贵的成就(如集体农作<sup>25</sup>), 正如意大利安那祺主义女作家 Marie Louise Berneri 所说: “我确信, 如果只是盲目地歌颂而不坦

---

<sup>23</sup> 安那祺主义者乔姆斯基对西方自由派学者关于西班牙内战研究的偏见进行过检验。不过, 他的语言学“大师”、MIT 终身教授的身份也避免不了主观见解。当然, 只要依据史实, 各种观点都值得参考。我很奇怪在《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3 卷 35 册, ISBN 7-80149-634-5/K. 08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余万字中没有收入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资料, 可能是因为西班牙对斯大林并不重要的原因。但苏联毕竟是佛朗哥的唯一终身敌国。

<sup>24</sup>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 8 卷, 收入本书第二部分。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三联书店, 2007 年) 虽然没有深入讨论西班牙内战, 但文笔生动, 也参照了最近的英文史料, 值得向不熟悉西班牙历史的中文读者推荐。

<sup>25</sup>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主要引用 Gerald Brenan, *The Spanish Labyrinth*, Cambridge, 1943 和 Gaston Level,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Spain*, London, 1938, 用一章(第 9 章)的篇幅介绍农业集体化的成就。“在阿拉贡, 75% 的小农自愿加入新的集体化秩序, 不愿加入的也得到尊敬, 顺其自然。” p. 100. “平均收成增加了 30%”, “在近代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安那祺主义‘各取所需’的原则” p. 101. “这是朴素人民的自发愿望, 他们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 以创新的精神和公正的态度顽强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西班牙劳工阶级显示了比欧洲任何国家的人民都突出的自发合作才干” p. 103. 本文的基本分析多借助于此书。

率地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的运动将会更快败坏衰退下去。”<sup>26</sup>本文的目的是从安那祺主义的角度来总结西班牙革命悲剧的教训。

### [为别人做嫁妆的选举]

1873年，西班牙成立第一共和，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又恢复了军人专政下的“君主立宪”。1931年，西班牙实行第二次共和（插图



庆祝集会)。共和政府着手广泛变革（包括言论、集会的自由，女性选举和离婚的权利），裁减臃肿的军队、实行土地改革、宗教教育改革（取消政府一贯给予教会的办学特权）、容许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自治等。这激起军人阶层、地主阶级、资本阶级、天主教和保皇派等右翼旧势力的反对。他们打出了“财产、信仰、统一祖国”的口号，在1932年8月举行暴动，被政府镇压；但政府的各项改革政策无法实施，南部安达卢西亚最贫困的安那祺主义农民1933年1月宣布成立共产主义公社，也遭政府镇压<sup>27</sup>。在1933年的大选中，左翼联合阵线瓦解，让右翼联盟夺回政权。右翼政府取消各种改革政策、大肆逮捕罢工工人，更加激起社会动荡。

在1936年2月的选举中，包括强大的全国劳工同盟CNT（数百万成员）和伊比利亚安那祺主义联盟FAI（FAI全员加入CNT并成为其核心，两者常常被相提并论）、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自治主义政党、受苏联控制的小党西班牙共产党PCE（成员不到3千人）、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工人党POUM（成员数百

---

<sup>26</sup> Vernon Richards (Berneri的丈夫),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扉页。Berneri和她的父母亲Camillo、Giovanna都因为反抗墨索里尼1926年被迫流亡出意大利。Camillo Berneri投身西班牙革命，1937年被共产党暗杀。

<sup>27</sup> 赵京“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的政治实践：卡沙维哈斯惨案”（前文）。

名)、受西班牙社会党影响的工人总联盟 UGT (与 CNT 旗鼓相当)、以及资产阶级共和派左翼等组成的“人民阵线”<sup>28</sup>, 获得总数 925 万选票中的 475 万票微弱多数(在国会获得 267 个席位, 远多于右翼联盟的 132 席), 得以组织政府<sup>29</sup>。

CNT 的领导层当然有现实理由(如为了释放政治犯)放弃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则参加政治选举, 但他们完全没有基本政治智慧保护自己的运动。且不说国际上英美等“民主国家”为了资本的利己不会反对西班牙的资本阶级和教会<sup>30</sup>, 国内失掉特权的现役、退伍军人阶层一定会再次叛乱, 而且会组织得一次比一次周全, 但除了 CNT, 没有别的全国性力量可以动员、并有决心准备抵抗军事叛乱。如果 CNT 不参与选举的政治游戏, 右翼会得到多数选票继续执政, 但在军人阶层没有借口政变的情况下, 右翼也不能维持统一, 推不出一个首领。这种动荡的政局维持下去, 等到欧洲(世界)大战爆发, 西班牙共和派就不会孤军作战了。<sup>31</sup>

---

<sup>28</sup> 这是在苏联-共产国际控制下的西班牙共产党的策略。弱小的共产党先通过“合作”, 控制了社会党的青年组织。

<sup>29</sup> 新华社的“西班牙内战”[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4/21/content\\_2859039.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4/21/content_2859039.htm)的“历史背景”中介绍: “1936 年 1 月, 西班牙共产党、共和党、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同盟等民主力量组成人民阵线, 2 月在国会选举中获胜, 组成联合政府, 实行民主改革。”完全不提最多成员的安那祺主义组织。

<sup>30</sup> 尽管英国的大多数民众同情西班牙共和, 但控制直布罗陀和葡萄牙的英国商人阶层和内阁官员都与西班牙资本阶级利益密切。法国在内战开始时以飞机援助共和国, 但得到英国“如果法国因为支持西班牙共和而与德意冲突的话, 英国不会支援法国”的立场, 很快就与英国一同采取德、意完全不理睬的武器禁运。美国从 1931 年一开始就对新兴的西班牙共和政府予以敌视。当内战爆发后, 美国政府禁止对西班牙政府的一切武器运售, 持“中立政策”, 但得克萨斯石油提供 350 万吨汽油的销售和无限期贷款、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提供 12,000 辆卡车、杜邦公司贩卖许多弹药给佛朗哥(数据引自维基百科)。只有墨西哥政府公开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 提供数量有限的军备, 后来也接受了大批难民。

<sup>31</sup> 这个观点来自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23, p. 29.

1932年的共和政府挫败过8月10日的准备得不算充分的军人叛乱，但这次1936年的叛乱策划长久，而共和政府完全没有对付叛乱的准备。6月12日，当时的总理Casares接到Yague上校在摩洛哥密谋叛乱的情报后召见Yague，要把他调回西班牙本土或派驻海外。Yague表示效忠共和，说他宁愿烧掉它的军服也不会离开部下，轻易骗取Casares的信任，回到摩洛哥继续密谋叛乱。三天以后，Casares又犯下一个致命错误。当Navarre州长接到Estella市长关于摩拉将军密谋的报告，命令武装警察civil guards把摩拉的住宅包围起来。但Casares接到报告后却命令州长撤离警察：“摩拉将军是忠诚的共和派，值得政府的尊敬”。更不可思议的是：6月23日，Casares接到袁世凯式的人物弗朗哥将军的密信，说只要任命他管理，就可以保证军队不会出事。这说明奸猾的弗朗哥脚踏两只船还在犹豫，而共和政府此时应该立即逮捕弗朗哥，实在不行拉拢弗朗哥也好（他那时在Canary岛上学习高尔夫和英语，并不是叛乱的密谋核心）。但Casares什么也没有行动<sup>32</sup>。7月17日，摩拉和弗朗哥宣布接手政权，武装叛乱开始了。但共和政府刚开始不相信军队真会叛乱，马上要把战争部长的位子让给摩拉！共和派的民众前往马德里政府中心要求得到武器，抵抗叛军，但Casares害怕武装的民众比害怕叛军更甚！安那祺主义运动就这样被其领导层愚蠢地为这样昏庸的政府做嫁妆。

### *[放弃社会革命的代价]*

幸好军队的部分军官和多数士兵（特别是控制海峡、港口的海军全部）拥护共和。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政府如此无能，以安那祺主义者为主体的平民能够自发地迅速在人口集中的2/3的地区平息叛乱的原因。发起军事叛乱的军官，首先要煽动起杀人的仇恨（普通西班牙士兵刚开始只是跟着起哄），但最初只在摩拉对要求分离的巴斯克人和弗朗哥指挥下的摩尔人对西班牙平民的屠杀中获得成功。在德国海军

---

<sup>32</sup> Preston, Paul. *The Spanish Civil War: Reaction, Revolution, and Revenge*.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7. pp.95-97.

援助下得以把摩洛哥军团运到西班牙本土的叛军仅控制南方贫瘠的安达卢西亚和北方的几个经济落后省份。共和政府除了国际正统性（尽管没有实际利用价值），还拥有占世界第二的国家金银储备（五百吨黄金），也控制着首都马德里、最大的都市巴塞罗那和主要的工业区巴斯克的钢铁与军工厂，以及主要港口、交通干线和重要经济作物产地，拥有更大的胜算。更具社会革命意义的是：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政府不存在了！

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运动在牺牲原则为别人做嫁妆的后，面临着历史性的社会革命机会。特别在安那祺主义的大本营巴塞罗那，法西斯叛乱当天就被轻易击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实际上垮台了。第二天，当CNT领导人 Santilan 和 Oliver 挎枪进入加泰罗尼亚政府大厅时，加泰罗尼亚左翼民族党的光杆“总统” Companys 显得非常诚实：“首先，我必须说你们CNT和FAI从来没有得到按其重要性应该得到的待遇。你们总是受到迫害。我很对不起你们。我过去同情你们，上台后却不得不反对和迫害你们。今天，你们击败了法西斯军人，你们是这个巴塞罗那城市和整个加泰罗尼亚的主人。我希望你们接受我们忠诚的党员、卫队和民兵的帮助。……你们已经胜利，所有的都在你们手里。如果你们不需要我这个加泰罗尼亚总统，现在就告诉我。我会成为你们的一员士兵，与法西斯战斗到底。另一方面，如果你们觉得我作为加泰罗尼亚总统，在西班牙的别的地方前途不明的情况下，可以继续战斗，请相信我作为一个人和政治家的忠诚。我今天相信，过去的耻辱已经死掉，加泰罗尼亚应该把自己置于最进步的社会事业的国家的前列”<sup>33</sup>。这正是实行社会革命、解散军队、警察等政府机构的最好时机，把所有政治家也编入民兵，共同抗击法西斯。

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个诚实的政治家 Companys 后来会因为巴塞罗那电话大楼的CNT话务员“监听”他与马德里政府的通话而与共产

---

<sup>33</sup>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p. 33-34.

党联手，命令手下警察武力接管电话大楼！<sup>34</sup>但在当时，大敌当前，Santilan 和 Oliver 不仅挽留 Companys 继续当总统、还把 CNT 服从 Companys 支配，Santilan 本人更“应邀”加入 Companys 的政府！更不用提 Oliver 后来还与另外三名同志加入几经易手后由“西班牙的列宁” Largo Caballero<sup>35</sup>组阁的政府！更重要的是，CNT 的领导层为此不得不完全放弃罢工等社会革命手段，避免“反对自己的政府”、“为佛朗哥开放战线”<sup>36</sup>。Vernon Richards 总结道：“如果说 1936 年 7 月 19 日是西班牙革命劳工在被压迫民众追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谱写历史篇章的一天，1936 年 7 月 20 日就是劳工们被自己的代表开始出卖的第一天”。<sup>37</sup>

实际上，在叛乱刚起的头几个月，有可能粉碎叛乱的，但 CNT 以外的各派却忙于瓜分政府权力，<sup>38</sup>失去了历史机会。所有四个安那祺主义“西班牙大臣”都留下过在政府当官的回顾。诚实的卫生部长

---

<sup>34</sup> 这成了 1937 年“五月悲剧”的前兆。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第 12 章专门讨论这个事件。巴金也有译文“巴塞罗那的五月事变”（罗塞利），1939 年 4 月上海平明书店出版。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更有详细的记叙。不过，要为贡巴尼斯说句公道话：贡巴尼斯逃到法国，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占领法国，逮捕了贡巴尼斯，将其交给了佛朗哥。佛朗哥以军事法庭名义，于 1940 年 10 月 15 日，就在巴塞罗那市区的山顶要塞里，枪决了贡巴尼斯。林达：“西班牙是怎样解决加泰罗尼亚问题的”

<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1/07/201107251439.shtml>

<sup>35</sup> 社会党人，1936 年 9 月任总理。《真理报》给他这个称号，是因为弱小的西班牙共产党需要通过“联合战线”拉拢强大的西班牙社会党。1937 年 5 月，当西班牙共产党足够强硬时，就把不听话的 Largo Caballero 拉下台。西班牙只有一个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列宁”：佛朗哥。

<sup>36</sup>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58.

<sup>37</sup>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35.

<sup>38</sup> 例如，政府不肯把后方的 6 万条枪发给在阿拉贡前线的以 CNT 为主的战士们。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78.



Montseny 承认是个失败<sup>39</sup>，司法部长 Oliver 却沾沾自喜他的成就。他对政府的那么多死刑的执行，对共产党的暗杀，抗议过吗？其实，他要是知道资本主义英国的 Howard 刑法改革联盟等工作，就会闭嘴了。倒是进入加泰罗尼亚政府的 Santilan 一年后坦率地承认：“我们不比别的任何官员好。事实证明我们进入政府只加剧了政府权能，根本没有改善劳工的经济、政治权利。”“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候两个主人。如果我们站在人民一边，就不可能站在人民的敌人-政府——一边。我们现在是政府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反对人民”<sup>40</sup>。“所谓‘工人国家’只是革命的终结和新奴隶政治的开始”<sup>41</sup>。在“五月悲剧”中，这些大臣们站在政府一边，被派往巴塞罗那，传达了“赢得热泪但不是服从的演讲杰作”，叫人民放弃抵抗。<sup>42</sup>Montseny 最后总结道：“我们 CNT-FAI 绝对单纯，不是搞政治的材料”。<sup>43</sup>

写到这里，我更沉痛反省 22 年前自己在日本组织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类似政治经历。在 1989 年 6 月 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攻占中国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到 6 月 8 日邓小平公开露面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级以上军官的历史时期，中国没有统治者（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已经失去了自由，台面上的李鹏、杨尚昆无能无德控制政府官僚）。我因为 1987-88 年“雁鸣”事件<sup>44</sup>受到迫害，赢得

---

<sup>39</sup> 她开初拒绝进入政府，最后征求她父亲的意见。老人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放弃安那祺主义。一旦权力在手，你不可能排除权力的罪恶”。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76.

<sup>40</sup>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69.

<sup>41</sup>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71.

<sup>42</sup>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132.

<sup>43</sup>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143.

<sup>44</sup> 我作为《雁鸣》杂志总编在 1987 年组织在日留学生政治意识调查，反抗大阪领馆命令公开发行，被香港《争鸣》、台湾《中央日报》转载，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最大的政治事件”，连护照也被迫上交。

在日中国同学的信任，组织民主运动。当我们中国留学生6月4日聚集在中国驻大阪领事馆门前时，一个与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特别是驻日大使）都有关系的留学生凑到我的面前。他在前一晚还拒绝我叫他加入游行抗议的电话，说北京还没有“摊牌”，现在要求我任命他当京都的留学生代表。在国已不国的大难当头，我天真地以为政治运动中每个人都有起码的良心，就同意他当京都代表，同时请另外一个同学当神户代表、另外两个同学负责捐款（姚明龙）和公关，我自任大阪代表而不愿当“领袖”。这是我们关西乃至整个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民主人权运动的悲剧的开端。这个学生奸细马上窜到我们几个人正中的位置，向媒体发表演说，特别在大阪记者俱乐部为我们准备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个箭步窜到中间的座位。我当时不断地轻轻拍他的腿，示意他望左靠，使我右边的两个同学也可以坐进来面向记者，同时也提醒他我们几人还要发言。他全然不顾，抓住话筒就不放手。会后，一个中年访问学者马上劝告我不要把这样的学奸引入我们的运动：“我经历了文革，也没有遇到过这样奸猾的人”。但没有政治经历的我哪里听得进这种“人性恶”的说教，明明看着他一步一步地利用、出卖我们，（例如他的“放弃中国高官”、“要用火与血改造中国”的“日记”也公布给《每日新闻》等发表），从日本政府那里谋到“神户大学法学副教授”的位子，帮助日本政府“保护”了这个唯一的中国留学生（被日本报纸报道为日本政府“保护中国学生”的国际义务事例），反过来为日本政府充当打手，疯狂地迫害我们在日本的中国民众。

在这段近代中日关系最黑暗的年代里，我后来连用中文、日文揭露这段沉痛教训的条件也没有了，只能用我的第三语言英文记录下来。这篇用血泪写成的历史“对民主的出卖：天安门的阴影笼罩日本”尽管得到“历史性突破”的有些评审专家赞扬，却找不到英文（更不用提日文或中文）刊物发表，最后由西班牙当代历史协会作为特征文章发表，成为最受欢迎文章。<sup>45</sup>只有经历了政治上最卑鄙的

---

<sup>45</sup>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Tiananmen's Shadow over Japan. *Historia Actual On-Line*, 4 (2004). 收入 Jing Zhao, *China and Japan: Research and Review*, ISBN:978-0-557-04795-6. 2009.

人性丑恶的西班牙，才能理解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利益交易，而是为了提升人性的价值！可悲的是，我们在日本被东京、北京、台北、华盛顿等国家权力迫害、出卖的教训，只是整个中国民权运动的缩影！<sup>46</sup>当然，如果我们都有政治“头脑”，人类的历史将会变成各种算计的投机纪录，人性将倒退到“人不是人”的地步，谁还愿意做人呢？

### *[无视国际革命的机会]*

如果说共和政府的其他各派既没有意识到摩洛哥对共和的威胁，也没有摆脱西班牙“帝国”蔑视阿拉伯等殖民地的偏见，具有革命传统的 CNT-FAI 也不例外。共和政府的安那祺主义者卫生大臣 Montseny 甚至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口吻指责佛朗哥“没有西班牙感觉”：“如果他们是西班牙人，是爱国者的话，就不会用摩尔人来推行法西斯制度。被我们殖民的摩尔人不是基督教文明，反过来要殖民我们”。<sup>47</sup>本来，这些安那祺主义的领袖们如果有一点佛朗哥的政治头脑，就应该想到在叛乱刚开始时，立即以西班牙政府的名义，宣布摩洛哥的独立！实际上，在内战初的头几个月里，没有失去人性的西班牙士兵还不习惯对自己的同族（特别是手无寸铁的老幼、妇女）大开杀戒，摩尔人被佛朗哥利用打头阵，被许以各种暴行自由的奖赏，搅动了整个西班牙的仇恨烈火，后来又被佛朗哥有意识地送死。

### *[放弃政治独立性的自由]*

即使失去了赢得内战的历史时机，安那祺主义者还有较好的机会采取一些独立自主行动，争取较好的结局。佛朗哥在军事上本来可以大为提前结束内战，但他利用已经胜利的战争，要把共和的种子彻底

---

<sup>46</sup> 2008年6月日，当这个学奸不再满足日本政权赏给他的“神户大学法学教授”的犹太报酬，甚至要偷窃我们当年几千人的“六四”捐款到清华大学骗取“法学院院长”的职位被暴露后（后实际捞到上海交大“法学院院长”的权位），人们才逐渐揭开他披的人皮。

<sup>47</sup>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83. p. 211.

杀光。这也为共和派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安排后路。例如，应该把国库的五百吨黄金从混乱的马德里运到安那祺主义支配下的巴塞罗那来以备后用，但CNT的头头们害怕搞坏已经互不信任的马德里-巴塞罗那关系。其实，连共和政府总统也逃到巴塞罗那、政府内阁也迁出马德里到巴伦西亚去了（1938年10月28日又从巴伦西亚迁至巴塞罗那）。在内战已经没有胜利可能的现实条件下，那五百吨黄金决不能“送到苏联保存”<sup>48</sup>，最好能够送到墨西哥以支撑流亡政府，等到大战的爆发；次策是由各共和派瓜分，即公平又安全，可以为上百万共和派流亡提供基本的经济条件，也准备日后政治上“卷土重来”<sup>49</sup>。至少，也可以送给被遣散的几万国际纵队的战士，让他们有条件安顿自己，同时为西班牙共和在全世界作义务宣传。据后来从巴塞罗那到美国留学、任教的Vicente Navarro记载：他到处寻找国际纵队林肯军团的老战士，悲哀地发现他们在美国麦卡锡主义反共阴影下不愿提及这段英勇悲壮的历史！<sup>50</sup>

因为只有苏联（带有拖延内战而不是击败法西斯的政治意图）的实质性援助，共和政府（特别是关押包括共和派的监狱）实际上处于苏联秘密警察和为数不多的西班牙共产党的控制下。共产党推行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谋略，为了政治（夺权）目的，坚决反对连社会党也同意的土地国有化等社会革命政策，让天主教影响下的农民没有愿望为共和而战，倒向佛朗哥。当共产党把“西班牙的列宁”也赶下台、又屠杀监狱犯人、滥杀国际纵队义勇军、暗杀具有托洛茨基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员（包括其领袖安德烈斯·宁）、1937年5月在

---

<sup>48</sup> 据说，斯大林嘲笑说：“就象他们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西班牙再也别想看到他们的黄金了”。决定运黄金到苏联的共和政府财务部长（后继任总理的）奈格林最后死在流亡地法国时，还念念不忘苏联的黄金借条，保管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希望苏联能够还给西班牙（佛朗哥）政府！

<sup>49</sup> 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政府倒是有人“流亡”或失踪在法国，直到西班牙在佛朗哥死后确立共和后，还得“正式”用仪仗队请他回西班牙“取消自治”。

<sup>50</sup> “The Lincoln Brigade: Some Comments on U.S. History.” Monthly Review Sept. 1986. pp. 29-37. 译文可见倪慧如、邹宁远《橄榄桂冠的召唤：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人间出版社，2001。

加泰罗尼亚施行军事政变挑起内战中的内战、<sup>51</sup>连国际纵队也被解散时<sup>52</sup>，安那祺主义者就应该坚决地退出政府，组织自己的力量实行战略性的撤退（确保港口和通往唯一外国-法国-的陆上通道），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牺牲。但是，安那祺主义的领导层明知自己在政治上的无知，却被权力腐蚀无法自拔。当共和政府内阁决定抛弃马德里逃到没有国际地位的巴伦西亚时，政府其实也被民众抛弃了。CNT的四个大臣确实抗议过，并表示他们要留在马德里与民众抗战到底，但最终还是舍不得大臣位子。他们逃跑的车队中途被愤怒的安那祺主义指挥官挡住，不得不返回马德里，却又乘飞机逃去巴伦西亚。

在巴塞罗那失陷、共和国总统和内阁都逃到法国的最后日子里，1939年3月5日至6日，本身没有政治野心的中部战线司令卡萨多上校幻想能够在马德里驱逐共产党后可以从佛朗哥得到宽容的投降条件，宣布接管政权，遭到共产党控制的军队的围攻，演出了内战尾声中的又一场内战。安那祺主义指挥官的军队制止了共产党军队的围攻，帮助卡萨多等人逃出马德里，自己等来了佛朗哥的行刑队。

### *[未完的结论]*

佛朗哥征服西班牙后，在英国、美国等政府的扶植下，维持独裁统治到1975年死去为止，但西班牙在他死去两年后再次实现共和。1981年，一小撮军官突袭国会，扣押国会议员们，企图发动政变，只

---

<sup>51</sup> 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也记录：格尔尼卡的大轰炸刚过去，巴塞罗那就同时大乱。奥威尔从前线回来，惊讶地发现，“政治上清醒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共产主义者和安那祺主义者之间两败俱伤的战争，而远非同佛朗哥战争。”仅一次左翼内战就有四百人死亡，一千人受伤。这种左翼间的“武装冲突”，“全国处处可见”。左翼内斗巷战的俘虏，都被关入监狱，“监狱里人满为患”。国际纵队也有人因“政治经历可疑”被追捕。警察甚至把医院里自己一方的伤兵都抓走了。但 Paul Preston (The Spanish Civil War: Reaction, Revolution, and Revenge.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7. pp.95-97.) 认为奥威尔的经历有偏见。请参见巴金译的“巴塞罗那的五月事变”（罗塞利），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

<sup>52</sup> 1938年9月21日，共和政府解散国际纵队，使外国士兵回到各个国家，幻想英法等国解除武器禁运，并迫使德意撤回军事干涉。

不过是一场闹剧。被佛朗哥一手养大的卡洛斯国王看清历史大势，通过电视转播谴责政变，得到西班牙社会的普遍尊敬。因为今天的西班牙共和已经不可逆转，西班牙民众不允许内战重演<sup>53</sup>。不仅如此，西班牙议会还通过决议，授予还健在的全体国际纵队战士以西班牙公民的荣誉身份；实现民主的西班牙法庭也传讯到英国治疗的皮诺切特，不允许这个智利的独裁者逍遥法外；因为切身经历了被国际强权（英、美、苏联等）出卖的西班牙深知国际正义的人类价值。安那祺主义也与西班牙民众一道成熟起来，没有去凑选举的热闹，也不再会听任任何试图把安那祺主义运动拿去做政治交易的“领袖”的出卖。

当然，正如那些经历西班牙内战和世界大战、国际冷战等人世沧桑的国际纵队的老战士所说：“如果历史重演，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经历了这么惨痛的教训，安那祺主义者还是会做出同样的牺牲选择！说到底，安那祺主义就是捍卫人性、不被各种政府权力利用倒退到兽性和野蛮的社会运动！

当罗马帝国的一个边远行省的小部落把他们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与两个小偷交给罗马总督处决的时候，谁会想到这成为人类文明的转折点？今天，我们安那祺主义见证、承受、反抗了人类近代社会误入国家主义以来的愚昧、战争、丑恶、悲惨的未开化的政治秩序，以殉道的精神向人类展示另一条自由、平等、人道的社会形态选择。克鲁包特金说得对：“如果耶稣再生，他只能是一个安那祺主义者”。

以此纪念 22 年前中国英勇悲壮的安那祺主义运动。

[2011 年 6 月 4 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

<sup>53</sup> 由此我们确认，中国的民主自由共和，不在于任何国家首领，而在于我们民众自身。

## 4. 西班牙安那祺运动的历史经验

Juan Gomez Casas 从小随父辈参加工会活动，15岁时赶上了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民众奋起粉碎叛乱、拯救共和的斗争。内战失败后，他继续坚持地下/流亡抵抗运动，1947年被佛朗哥军事法庭判处30年徒刑，在监狱大学里（实际坐牢15年）对西班牙安那祺主义的历史痛切反省。佛朗哥死后，Casas 两度担任西班牙全国劳工同盟 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CNT) 的书记，由他来介绍、评论西班牙安那祺自由运动的历史是很恰当的，比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更有广泛的政治理论价值。这本关于伊比利亚安那祺主义者联盟 Anarchist Federation of Iberia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FAI) 历史的论著被译为英文后<sup>54</sup>，成为西班牙语世界以外唯一了解、思考、反省 FAI 经验教训的较完整记录<sup>55</sup>，在安那祺主义运动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不可多得。

外界习惯把 CNT-FAI 看成一体，因为它们都信奉安那祺主义



（附图的游行和征兵相片上的旗帜都把两者写在一起）。1910年成立的 CNT 作为工会团体，在内战高潮期间达到一百五十万成员规模；FAI 作为意识形态团体，从 1927 年成立到 1939 年解

---

<sup>54</sup> Anarchist Organis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stein. Black Rose Books, 1986.

<sup>55</sup> CNT-FAI 档案在内战结束时被运到阿姆斯特丹的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作者写作此书时没能利用这些资料（14 页）。

体，成员为五千到三万之间。其间，它们的一些更激进的青年成员（包括此书作者 Casas），也作为单独的 Libertarian Youth（自由青年）组织活动。CNT 与 FAI 的关系虽然错中交织，但在 1933 年 1 月的罢工失败事件中可以看得很明白：CNT 组织了全国罢工，但在紧急时刻，最关键的部门—铁路工人—没有行动起来。怎么办？以 Ascaso、Durruti 杜鲁底、Garcia Oliver 为中心的 FAI 活动人



士，果断地以 FAI 的名义承担起罢工失败的责任，挽救了 CNT 内部的分裂，减轻了当局对 CNT 的大规模镇压。1936 年 5 月，FAI 解释道：“我们没有计划罢工，我们支持 CNT 计划的罢工。当我们看到 CNT 撤销自己的计划时，我们没有抗议。我们理解工人组织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出现反复，但这种反复不是出卖。”（136-137 页）。实际上，FAI 还没有成立前，以杜鲁底为首的安那祺主义小组在 1922 年 4 月就采取过同样的战术组织 CNT 罢工：如果失败，就由安那祺主义者承担责任。罢工胜利后，宪法得以恢复，CNT 名声大振（63 页）。

我在“第一国际在西班牙创立的公案—兼论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已经介绍、引用了此书第一章的内容，总结道：“西班牙社会主义在经历屡次政府镇压后反而发展壮大，... 才真正体现了国际的精神，是国际的真正传人。”<sup>56</sup>1910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成立的 CNT 除了在精神和成员来源继承国际，也受到自由近代学校创始人 Francisco Ferrer 的殉难悲剧<sup>57</sup>和法国的工联主义的影

<sup>56</sup> 2014 年 3 月 3 日，<http://cpri.tripod.com/cpr2014/spain.pdf>

<sup>57</sup> 西班牙的教育是天主教的垄断专利，他们对于劳工阶级摆脱他们的控制、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又怕又恨，要当局在一天之内审判、处决了 Ferrer（48 页）。



响。虽然安那祺主义和工联主义都来源于法国，但两者在法国是分离的，正是 CNT 的实践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到一年就发展到 3 万成员（51 页），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安那祺-工联主义，代表了（第一）国际的精神，提供了不同于第二（社会民主党）国际、第三（共产）国际的社会主义方向。

肤浅的作者容易把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运动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突出贡献和影响与西班牙的（相对于欧洲其他地区的）低级文化程度联系起来，那些响应安那祺主义理想揭竿而起的安达卢西亚文盲山民就是典型的例子<sup>58</sup>。但 Victor Manuel Arbela 的研究表明：1869 年-1923 年期间，安那祺主义者在西班牙出版了 103 种报刊（15 页），说明这是文化宣传的效果。而且，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者们在理论上也充分争论过指导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无产阶级先锋队”（社会党或共产党领袖们）能够创造<sup>59</sup>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觉悟）指引革命、改变社会，为什么不能把（决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经济规律也改造一下（89 页）？一个全能的前锋队指导下的盲从大众建立的秩序决不是安那祺主义的基于个人自由联合起来的社会 federalism（90 页）。

1926 年，流亡在巴黎的俄国安那祺主义者们（包括马赫诺、阿西诺夫<sup>60</sup>）基于俄国革命被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取代的教训，发表了引起广泛争议的“安那祺主义者总同盟纲要”Platform of the General Union of Anarchists，其中倡议建立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执行机构”（政治局），要求安那祺主义者个人担负“集体责

---

<sup>58</sup> 见笔者介绍的“卡莎维哈斯惨案”，2007 年 1 月 1 日。

<sup>59</sup> 按照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的指示，要靠马克思和他这样的先知来灌输给大众。

<sup>60</sup> 见笔者《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国际书号：978-1-4583-0411-7）第一章“马赫诺运动”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acr-6.pdf>

任”。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者已经拒绝了类似的“危险、含糊”提议（104页），因为它们违背了自发、自由的基本原则。实践高于理论，不可能为未来制定完全的规划。普鲁东说得对：思想来源于行动，又必须回到行动中去（159页）。他们比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先知先觉”，拒绝了列宁主义的一党专制带来的无尽变种弊端（从斯大林体制到金氏三代王朝）。

经历多年的理论和实践，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流亡在法国的西班牙安那祺主义组织 1927 年 7 月 25 日终于在瓦伦西亚举行了历史性的 FAI 成立会议。除了确认安那祺主义的路线纲领外，最令人感动的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对葡萄牙代表同志们的情谊：实际负责组织事务的加泰罗尼亚代表团建议由葡萄牙同志们组成第一届秘书处以显示伊比利亚半岛的安那祺主义团结。“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葡萄牙同志们，会场一片寂静。葡萄牙的同志们感动得眼泪盈眶、说不出话来。最后，他们指出秘书处应该设在会员多的地区”（115页）。在才是国际的真正精神！秘书处不是政治局，没有指挥大众的权力。

FAI 成立后，总是与 CNT 全国大会同时举行自己的大会，CNT-FAI 的用法也被人们自然地接受（121页）。为什么没有人接受“FAI 夺取了 CNT 领导权”这种奇怪的说法呢？因为 CNT 本身“没有中央权力可以夺取。CNT 彻底分权，所有决议和政策都从地方工会开始，达到省、区域和全国的联合会”（9页）。“需要强调的是：不管代表是不是 FAI 成员，他们代表的决议都是在他们的工会全体成员大会上决定的。在全国大会上决定的事项也要向他们的工会全体成员大会汇报，代表们不可能支持个人的、没有代表资格的决议”（121页）。实际上，被认为是西班牙安那祺主义灵魂的以 Ascaso、杜鲁底、Oliver 为中心的 Los Silidarios 小组，1931 年出狱后并没有加入 FAI，“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自己的安那祺主义倾向，但总是坚持认为他们的力量在于工会”（122-123页）。同时，他们在 1931 年 5 月 1

日的国际劳工节游行抗议中，以 CNT-FAI 的红-黑旗帜主导、直接向来压制游行的警察挑战：“为 FAI 让路！”，以备万一遭到镇压时，他们又以 FAI 的身份为 CNT 承担责任（124 页）。从这种意义上说，FAI 可以被称为革命的布朗基主义者（128 页），一方面被千方百计试图清除工会中的安那祺-工联主义的政府当局污蔑为“持有工会证的匪徒”，另一方面在工人阶级和家庭主妇中获得传奇般的称颂（129 页）。安那祺主义、或者因为被政府检阅叫自由主义 Libertarian<sup>61</sup>，成为工会以外的民众蜂起（如 Casas Viejsa<sup>62</sup>）的旗帜。

Abel Paz 称赞 Ascaso、杜鲁底、Oliver：“他们三人学会了巴枯宁的两个基本原则：对劳工阶级的创造能力的绝对信赖和建立革命组织的必要性”（148 页）。1933 年 1 月失败后，杜鲁底在狱中写下了他唯一发表过的文章，表明：“我们从没有认为革命可以由一小撮人夺权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众。我们的革命觉悟反对这种战术。我们的革命由民众完成、为民众服务，没有这个条件任何革命都是空想。除此之外的革命只不过是夺取国家权力的政变。我们来自工厂、矿山和农场，需要的是改变社会的革命，与布朗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毫无关系。我们必须随时准备革命，但谁也不知道革命何时爆发”（149 页）。“任何战士都不应该在一个委员会里被任命的岗位上停留更长的期间。我们没有永久的任命，也没有不可取代的领导人”（155 页）。1936 年 2 月西班牙议会选举时，杜鲁底看得很清楚：“左翼宣言：如果右翼获胜，他们就要发起革命；右翼威胁：如果左翼获胜，他们就要发动内战。我们处在革命或内战的前夜，我们必须清楚地警告劳工阶级：投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问题只能在手持武

---

<sup>61</sup> 原义更接近克鲁包特金的 Anarchist Communism，但后来被找不到自己概念表达的哈耶克等偷去作为资本阶级自由主义的旗号。

<sup>62</sup> 见笔者介绍的“卡莎维哈斯惨案”，2007 年 1 月 1 日。

装的街头解决”（154页）。CNT全国委员会1936年2月14日发布的宣言特别指出：“摩洛哥是谋叛的焦点”（155页）。此时，CNT有大约1百万名成员，FAI有496个小组、估计为5千名成员（178页）。正是他们帮助左翼（社会党和共和派）获胜成立共和政府，又力挽狂澜拯救、誓死捍卫共和，写下了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历史和人类历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

对于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运动在内战期间决定加入政府这样一个非常特殊历史条件下违背安那祺主义原则的决定，安那祺主义者们至今依然没有定论（251页）。法国的著名安那祺主义者Faure当时就预言：“任何安那祺主义者与反对安那祺主义的政党的哪怕是暂时的合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欺骗，而安那祺主义者总是受害者。这已经被经验、历史和简单理性所证明。在哪怕是临时和短暂的合作中，安那祺主义者的忠诚和诚实总是被那些权威主义者伙伴们欺负和出卖”（204-205页）<sup>63</sup>。历经镇压的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当然知道这些，杜鲁底对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的

记者发表的谈话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誓死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当资产阶级看见权力从它的掌握中溜走时，它得向法西斯主义求救来维持自己。西班牙的自由派政府本来很久以前就可以将法西斯分子的力量削除的。他们不此之图，却踌躇不前，调和妥协，浪掷时间。甚至在目前，在目前这个政府中，也



<sup>63</sup> 每次读到安那祺主义的这一类教训，我脑海里总是一幕一幕地显现出1989年我们中国民主人权运动在日本被出卖、迫害的景象：为什么自己那样幼稚无知呢？为什么总是不肯相信政治中“人性恶”的警告呢？但是，如果我们都“聪明”的话，就不会有人类文明的历史了。

还有人想同叛军客客气气，不要严厉对待。你可别叫表面的现象给欺骗了，你知道——你笑了起来——我们现在的政府也许会需要这些叛军来扑灭工人运动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目前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苏联，这对我们说来并无意义——为了这个国家的和平与安静，斯大林却将德国和中国的工人当作牺牲，奉献给法西斯的野蛮统治。我们要在此地，在西班牙干革命，而且现在立即就干，不要延迟到下次欧战之后。我们用我们的革命所给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烦恼，比俄国整个红军能给他们的烦恼更甚。我们给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做了一个榜样：该如何去对付法西斯主义。”<sup>64</sup> 问题是：如果没有安那祺主义的支持，共和政府一天也维持不下去。那么，共和政府中的那些资产阶级共和派、加泰罗尼民族自治派、社会党人（“西班牙的列宁” Caballero）、共产党人（第三国际的代理）为什么要不惜输掉内战而利用、出卖甚至镇压安那祺主义者呢？可惜安那祺主义运动在 4 个月内就失去了无可取代的领袖：杜鲁底（插图中）1936 年 11 月 20 日就牺牲在前线，而 Ascaso（插图左）在第三天（1936 年 7 月 20 日）扑灭叛乱的战斗中就牺牲了。



正如笔者在“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从西班牙内战悲剧中的教训”<sup>65</sup>中总结的那样：“持续了将近 3 年（1936 年 7 月 17 日—1939 年 4 月 1 日）的西班牙内战则是安那祺主义运动在与资产阶级共和派、国家社会主

<sup>64</sup> 此书 206 页。译文引用王凡西 译自斐列克斯·莫罗著《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

<sup>65</sup> 2011 年 6 月 4 日。所有引用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网站 <http://cpri.tripod.com> 为准。

义政党和新起的共产党又合作又被出卖（内战中的内战）的过程中，被以佛朗哥为首的旧军队、地主阶级、资本阶级、天主教会和保皇党势力联合的血腥法西斯军事独裁击败和报复的悲剧。”其中的转折点就是1937年5月初在巴塞罗那发生的“内战中的内战”事件，它导致了具有独立和托洛茨基色彩的POUM的瓦解和它的领导人Nin被暗杀<sup>66</sup>、社会党领导人Cabalero政府的解散、CNT退出政府以及安那祺主义影响消退、加泰罗尼亚政府失去自治权力、共产党人Negrin的上台以及共产党在各级权力中夺权（209页）。虽然各派都害怕失去苏联的援助而不敢得罪西班牙共产党，但内战初期只有几千人的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大权独揽呢？除了社会党无能抵抗、自身没有力量的加泰罗尼亚“总统”Companys想借用马德里政府打击加泰罗尼亚的唯一力量安那祺主义者外，安那祺主义者群龙无首、没有组织反抗是致命的失败。当时国防委员会还在CNT-FAI控制之下，它无动于衷（208页），可能它们同意要由中央政府、也以为他们自己可以接管加泰罗尼亚政府。国防委员会的书记Molina曾经是FAI的书记，他竟然拒绝了广大CNT战士的请求，不肯把Huesca战线的安那祺主义者纵队调回巴塞罗那（212页）。又据FAI老会员、当时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委员de Santillan回忆，当遭到Companys一个班威胁时，他打电话给安那祺主义者控制下的炮兵连，命令他们随时准备好向Companys的自治政府开炮（211页）。“我们有能力回到瓦伦西亚、拒绝承认对Pozas将军和他的军官的任命，我们也能阻止Torres上

---

<sup>66</sup> 乔治·奥威尔偶然加入反对西班牙共产党的POUM(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on Marxista 马克思主义联合党)组织的民兵，被派到安那祺主义民兵战斗的阿拉贡战线。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译者李华，刘锦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已经成为经典记述。见笔者对此书的摘录（主要为关于安那祺主义的部分，校注根据Orwell in Spain. Ed. Peter Davison, Penguin Books, 2001，与原译文所用的版本不同，在一些政治用语、意义和重要的意思表述上改动较多。同时简略参照由Lionel Trilling作序的1952年New York的Harcourt, Brace & World公司出版的版本）。

校带领的武装卫队和前线部队。但是我们的运动的领导者们缺乏自信，我们没有一个领导核心在危机时保持我们的地位”（212 页）。“除了退缩和惰性，我们运动的代表们经历了蜕变。他们反映了那时的组织结构所受的、从来没有渗透到我们的运动的精神状态的影响”（213 页）。“这是 CNT-FAI 能够改变内战和革命时期的重要战略事件，但他们的领导人们缺乏实施这个战略的勇气”（211 页）。“CNT 和 FAI 靠适应环境残存下来，但它们失去了自己的品格和定位，它们无法不去支持反对革命的政府，也就失去了一切”（214 页）。这时，“我们突然意识到完全失去了加泰罗尼亚的自治，以及失却了整个内战”（211 页）。

当然，正如安那祺主义第一次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必然面临失败的悲剧一样<sup>67</sup>，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近代史上的悲壮牺牲<sup>68</sup>，正是为人类背负的政治十字架，启示了我们可以选择人类从来尝试过的基于自发良知的自由平等的社会秩序。

[2014 年 4 月 19 日]

---

<sup>67</sup> 赵京“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2010 年 11 月 8 日第二稿。所有引用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网站 <http://cpri.tripod.com> 为准。

<sup>68</sup> 从国际政治的环境看，英国控制着直布罗陀海峡，可以与忠于共和的西班牙海军阻止叛军从摩洛哥运输到西班牙。葡萄牙也在英国的控制之下，但英国得到佛朗哥承认英国在葡萄牙利益的保证。为了避免与德国冲突，英国也威胁想要资助西班牙的法国：如果德国为西班牙参战而与法国交战，英国将不履行同盟义务保护法国。美国也受英国的态度影响，默许它的公司向佛朗哥出售武器。

## 1.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纲领<sup>69</sup>

马克思主义统一问题

不幸，革命所需要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在西班牙还不存在……

西班牙共产党并非我们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正式支部，它服从于苏联国家的外交政策，它不得不根据常自相矛盾的苏联外交而行动，而非根据我国革命运动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作为“工农联盟”<sup>70</sup>同共产主义左翼联合的产儿，坚信：让一个现存政党囊括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的。问题并非在于“打入”或“吸收”，而在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通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联合，建立一个新的党，是必要的。

工人党<sup>71</sup>坚信，完成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统一的基本条件是：

第一：西班牙革命是一场民主社会主义革命，面对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无产阶级不能和平取得政权，而需要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第二：一旦取得政权，应当实行作为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机构应当是工人联合会。无产阶级专政预示着全面、完全的工人民主。革命政党不应当也不能窒息这一民主。

第三：对工人联合会的需要既是地方的，也是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必须通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作为领导防御和进攻以及合法和非法

---

<sup>69</sup> 首次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谁？他们想要什么？》，巴塞罗那，1936年版，第7至9页。该纲领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实践不完全吻合。

<sup>70</sup> 西班牙一个政治组织。

<sup>71</sup> 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行动的统一阵线的机构；第二阶段，作为起义的领导机构；第三阶段，作为政权机构。

第四：承认民族问题[的存在及其重要意义]。西班牙应成为伊比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第五：首先应当民主解决土地问题。土地归耕者！

第六：面对战争，应当将帝国主义战争转为国内战争。不对国联这一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抱希望。

第七：统一了的党应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外——两者均已破产。应为新基础上的世界革命社会主义联合而斗争。

第八：通过国际工人阶级的行动保卫苏联——而非促使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条约的政策。

第九：在统一了的党内应长期实行民主集中制。

## 2. 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纲领<sup>72</sup>

托洛茨基主义者想要什么？

1. 用唯一有效的武器——无产阶级革命——击败法西斯主义。通过剥夺原剥夺者和全面打碎旧国家机器来消灭法西斯主义及其繁荣的根源——资本主义民主的腐臭土地。在过渡时期，我们要求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残余作斗争——资产阶级残余借助国际资本主义妄想重新建立私有制及资产阶级政权。这一尝试的最好例子就是当前资产阶级的欺骗伎俩——尤其是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无产阶级专政会真正实行工人民主，因为财产的特权会消失，而且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2. 只要无产阶级还没能夺取政权，我们就会保卫工人在资本主义暂时政权的框架中的民主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开地——也不带任何政治欺骗——要求全国劳工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结成[工人]斗争的统一阵线。我们绝不允许阶级敌人破坏工人自己的组织，即使当我们的政治对手提出这样的要求。昨天，我们要求保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今天，我们抗议把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排挤出人民法庭；明天，武器在手，我们将保卫全国劳工联盟。我们过去是，而且将继续是无产阶级民主的热烈支持者。

3. 我们支持建立起工人、农民、士兵革命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当是由每一工厂、每一村庄、每一连队民主选举产生。可根据多数选民的要求随时撤换苏维埃的代表。这样的委员会已在七月<sup>73</sup>形成。群众的真实要求是，承认他们尽可能自由的权利。这样的委员会将会服

---

<sup>72</sup> 英译本根据C.L.R.詹姆士的《斗争》(Fight)月刊重印。西班牙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即第四国际支部)仅有8人。

<sup>73</sup> 指1936年7月。

务于群众的任务——保卫革命成果，维持社会治安，管理经济与分配。每一个[委员会里面的]党都可提出自己的提案，让群众来决定[采取哪种提案]。

4. 我们反对那个所谓的“人民阵线”政府——实际上，这个政府并未代表绝大多数人民。我们反对阶级合作，因为这是包办替代工人阶级的陷阱。这样一个政府中的妥协只能导致彻底的背叛。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每一处都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并召开全西工农兵委员会代表大会，从各地工农兵委员会的代表中选举出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来管理国家。只有这样的革命委员会才不会背叛，才能把战争引向胜利。

5. 我们的目标是完全剥夺资本家。到目前为止，银行尚未被触及，交换方式仍然处于资产阶级政府的控制之下。我们坚决拒绝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要求的“自治”，“自治”实际上从工会手中夺取企业，使企业处于反动政府的控制下。我们的口号是：在革命委员会的经济委员会领导下，实行完全社会化，建立对外垄断贸易。

6. 我们要求土地国有，即废除私人土地所有制。高利贷者不能再从农民手中夺取土地了。我们支持农民自愿的集体化。土地的分配必须由农民委员会根据下述原则进行：“土地归耕者”。

7. 我们坚信，只有在统一指挥之下的集中的军队，才能确保军事胜利，但军队必须是一支士兵有民主权利的革命军队，所有人员的薪金相等。军队应由革命委员会下的战争委员会统一指挥。这样一支军队中，士兵的积极性和革命警惕性会弥补物质和技术方面的不足。这将是一支常胜军。

8. 我们支持少数民族自决权，支持摩洛哥人民的绝对自由，包括其分离的自由，摩洛哥应归摩洛哥人！这样的口号一经公开宣布，将[实际上]鼓动被压迫的摩洛哥人民起义，从而使法西斯雇佣军崩溃。我们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邦，因为这最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它将由所有自由的、兄弟般团结的工人自愿组成。

9. 我们与斯大林主义官僚进行斗争，他们自称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而在全世界——包括西班牙——破坏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世界革命和在全世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胜利不被官僚集团——就像苏联官僚集团那样——所篡夺。我们反对由第三国际人民委员和第二国际资产阶级部长所实践的“不干涉”政策。我们要求革命的无产阶级干涉，并将西班牙革命转化为欧洲革命。

10. 旧组织已经带我们走到死胡同了。深信着将战胜所有法西斯匪帮和依赖“有力领导”的整个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我们将集中力量建立起一个革命的政党，来适应这一任务。它的牢固基石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列宁、托洛茨基继承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可耻背叛后，我们将在一个新的第四国际——一个世界的社会革命政党——中再次集合所有坚定的革命者。在它的未被玷污的旗帜之下，社会主义将取得胜利！同志们！我们知道，首要任务是击溃佛朗哥。但是你，像我们一样，了解军事胜利和社会革命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公开地，不带政治欺骗地反对那个让我们损失惨重的政策。社会革命的深入，不但不会削弱战壕里的统一阵线，还会加强我们民兵的战斗精神。我们希望让1936年7月精神重生！

用战斗岁月的热情，和今天的武装和经验，我们要在一个挣脱了资本主义枷锁的社会主义西班牙庆祝1936年7月！

.....

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第四国际）

巴塞罗那，1937年7月19日

##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摘录）

[英] 乔治·奥威尔

### 第 1 章

这件事情发生在 1936 年 12 月底，离现在还不到七个月，但这段时期已经消失，遥不可及了。……我来到西班牙，初衷是写一些新闻报道，但我几乎立刻就加入了民兵组织，因为在那个时期和那种氛围下，这似乎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唯一能做的事情。安那祺主义者仍然实际上控制着加泰罗尼亚，革命仍然处于高潮之中。对于任何一个从革命爆发就在那里的人来说，甚至在当年十二月或次年一月，革命时期正在结束，但是对一个直接从英国来的人而言，巴塞罗那看起来令人吃惊，压倒一切。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一个工人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的城市。各种建筑无论大小都被控制在工人阶级手中，插着红旗或安那祺主义者的红黑两色旗；每一面墙上都被涂上锤子和镰刀的标记，以及革命政党的缩写字母。每个教堂都被清洗，所有神像都被焚毁。各处教堂都被工人逐一地破坏了。每间店铺和咖啡店的门口都写有文字，说明其已被收归集体所有；就连擦皮鞋的儿童加入集体化了，他们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红色和黑色。服务员和跑堂的直视你的脸，把自己当作和你完全平等的人。卑躬屈膝的和礼仪性的套话暂时消失了。没有人说‘Senor’（大、老）或者‘Don’（先生、老爷）甚至是‘Usted’（您），每个人都称别人为“同志”、“你”。……我的第一个经历是试图给一位电梯服务员小费，受到了酒店经理的告诫。没有私人汽车，它们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有轨电车、出租车，以及大部分其他交通工具，都被漆成红色和黑色。革命的海报用醒目的红色和蓝色印刷，四处张贴，贴在墙上相当显眼。相形之下，残留在墙上的为数不多的昔日广告招贴画，像是一些胡乱涂抹上去的毫无价值的东西。……从表面上看，这座城市的富有阶级已经消失了。除了很少一部分女性和外国人，这里根本没有穿着像样的人。每个人都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或蓝外套，或不同样式的民兵制服。所有这些都奇特、感人。这里有很多我不理解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根本不喜欢，但

我立即认识到这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状况。我也相信，事情就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这里确实是一个工人国家，所有的资产阶级不是逃走、被杀掉了，就是自愿地转向工人阶级阵营。……

这个城市看起来灰暗不堪肮脏，公路和建筑物几乎无人维护。为防空袭，夜晚的街道昏暗无光；大部分商店非常破旧，几乎空空如也。肉类奇缺，牛奶简直难觅踪迹，煤炭、食糖和汽油都十分匮乏，更为严重的是面包供不应求，购买面包者排成的队伍常常达数百码长。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判断出，这里的人民是满足的和充满希望的。这里没人失业，维持生存所需的费用仍然极其低廉；你很难看到极端贫困的人，除了流浪汉之外，也很难看到乞丐。最重要的是，人们有着对革命和未来的信念，产生出了一种突然进入平等和自由时代的感觉。人们尝试着表现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个个小小的齿轮。理发店里贴着的安那祺主义者的通告（大部分理发匠都是安那祺主义者）庄严宣布，理发匠不再低人一等了。大街上张贴着彩色的海报，呼吁废除娼妓制度，让妓女从良。……

指导我们的中尉是一个结实的、没有经验的、令人愉快的年轻人，以前是正规军军官，就他整洁的仪容和崭新的制服来看，现在也依然像个正规军军官。最奇特的是，他还是一个忠诚和热情洋溢的社会主义者。他坚持在所有的队列中实行完全的社会平等，这比那些队伍中的民兵自己所要求的还要彻底。我还记得，当一个幼稚的新兵叫他“先生”时他的那副带着痛苦的惊讶神情。“什么！先生？谁叫我先生？难道我们不是同志吗？”

### 第 3 章

在这时以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加泰罗尼亚的民兵始终坚守自己在战争开始时的阵地位置。在弗朗哥政变的早期，各工会和政党大都匆匆忙忙地组建了自己的民兵队伍；每一个民兵组织实质上就是一个政治组织，它们效忠于自己的政党，犹如效忠中央政府。名义上不属

于任何政治派别的大众军在 1937 年初按照常规方式组建，党派民兵从理论上来说已合并到大众军中去了，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任何改变，仅仅停留在纸上。新建起来的大众军的大部分人马迟至六月才开赴阿拉贡前线，在此之前整个民兵体系没有做出任何变化。这一体系的根本特征在于官兵之间的社会平等。民兵组织中的每一个人，从将军到士兵，大家拿同等的薪金、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一切都完全平等。如果你拍拍将军的背，向他要一支香烟，没有人见怪。理论上，民兵是民主的而非等级组织。大家都理解命令应当被执行，但当你发出命令时，你所发出的命令是同志式的，而不是上级对下级的方式。这里虽然也有军官和军士，但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军阶、军衔、徽章，以及咔嚓一声立正敬礼之类的东西。他们试图在民兵中创造一种暂时的无阶级社会的工作模式。当然，这还不是理想的平等，但这比我在战时曾经看到过或想到过的一切都更接近于理想。

.....后来，指责民兵成为一种风气，甚至连训练不足和武器奇缺的结果也被归咎于民兵的平均主义制度。事实上，刚组建起来的民兵队伍是一群无纪律的乌合之众，原因并非在于军官们被称为“同志”，而是因为任何一支军队在草创时期都必然如此。事实上，民主的“革命”式的军事纪律比预期的要好得多。在一支工人民兵队伍中，军事纪律在理论上自愿的。这种纪律建立在阶级忠诚的基础上。相反，一支资产阶级的征募队伍的纪律最终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取代民兵的大众军则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普通军队中盛行的欺凌和辱骂行为，在民兵队伍中任何时候也不能被容忍。在民兵队伍中正常的纪律处罚依然保留着，但处罚只被适用于最严重的过失。当某个人拒绝服从命令时，不会立即让他受到惩处，人们首先要以同志式的态度对他进行劝导。没有经验的嘲笑者会立刻说这样做决不会“起作用”，但事实表明这样做从长期看的确“起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是民兵中最不守纪律的一些人也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一月份，为了让十来个新兵达到要求，把我的头发都快折腾白了。在五月，我一度担任代理中尉的职务，指挥三十个人，其中有英国人，也有西班牙人。几

个月来，我们持续遭受进攻，在下达命令或要求自愿从事某项危险工作方面，我几乎从未遇到过什么困难。“革命”纪律依靠政治觉悟——理解服从命令的原因。要把这种观念推广开来需要时间，但是要把一个人训练成兵营里的机器也同样需要时间。嘲笑民兵体系的新闻记者也许很少记得，当大众军尚在后方训练时，是民兵们在前线坚守着。从根本上来讲，民兵能守在阵地上本身就是对“革命”纪律的力量的颂扬。直到 1937 年 6 月，民兵们能够坚守在那里，靠的就是阶级忠诚。个别逃兵有可能被枪毙——在偶尔情况下也确有逃兵被枪毙——但如果上千人决定脱离战线，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强征入伍的军队处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督战队早就逃散了。尽管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赢得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民兵们却在固守前线阵地，连个别临阵脱逃者也罕见。在置身马克思主义联合党 POUM 民兵中的四、五个月里，我只听说有四个人开了小差，而且其中有两个人无疑是间谍，他们来到民兵中完全是为了获取情报。

## 第 5 章

……更为重要的是，西班牙工人阶级并非像我们在英国那样仅仅以“民主”和“维持现状”的名义反对佛朗哥，他们的抵抗运动带有——也可以说包含着——十分明显的革命爆发性质。土地被农民夺取，工厂和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被工会夺占，教堂被拆毁，牧师被赶跑或杀害。而在天主教牧师的欢呼声中，《每日邮报》则把佛朗哥描绘成一个爱国者，使他的国家脱离可怕的“赤”祸。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佛朗哥真正的反对者不是政府，而是工会。早在叛乱爆发时，组织起来的城镇工人就号召进行总罢工，要求分发、并通过战斗夺取弹药库中的武器。如果不是他们完全自发和独立的行动，佛朗哥根本就不会遇到抵抗。当然，事情并非必然如此，可至少有理由这样认为。尽管很早就预料到叛乱的爆发，但西班牙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阻止。叛乱发生后，政府表现软弱，



态度游移不定，以至于西班牙在一天之内竟更换了三位总理（基罗加、巴里奥斯和希拉尔，前两位拒绝把武器分发给工会）。而且，政府只是不情愿地让工人获得武器以应急对付广泛的暴力骚乱。然而，武器已经散发，在西班牙东部的一些大城镇，在一些仍然效忠政府的武装力量（突击卫队等）的帮助下，主要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奋战，打败了法西斯主义者。这是那些只有为革命——例如，相信为了改变现状而战——才能采取的行动。在各地的反叛中心，据说一天就有三千人战死于大街小巷。男男女女们仅凭手中的雷管和炸药在广场上左冲右突，捣毁了训练有素的士兵用机枪把守的堡垒。法西斯主义者在战略要害部署的机枪阵地被时速六十英里的出租车冲毁。即使从未听说过农民夺取了土地、建立了当地苏维埃等等，很难相信作为抵抗运动中坚力量的安那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在保卫资本主义的民主事业。特别是在安那祺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民主只不过是中央集权化的虚伪工具。

与此同时，工人手中掌握着武器，他们现在拒绝交出武器。（据说即使在一年以后，加泰罗尼亚安那祺-工联主义者仍拥有三万支步枪。）在一些地方，支持法西斯的大地主的土地被农民夺取。工业和交通部门出现集体化运动，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们开始通过成立地方委员会建立了工人政府的雏形，用工人巡逻队取代了支持资本家的旧警察，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人民兵，等等。当然，这一进程并没有在各地同步发展起来，加泰罗尼亚行动得最彻底。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机构几乎没有受到冲击，有的地区政府与革命委员会同时并存。在一些地区，安那祺主义者建立了独立的公社，有些存在了一年之久才被政府压制下去。在加泰罗尼亚，安那祺-工联主义者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掌握了实权，控制了大多数关键性的工业部门。事实上，西班牙所发生的不只是内战，而是革命的开始。西班牙以外的反法西斯新闻媒体将实质遮掩，把问题狭隘地解释为“法西斯与民主之间的斗争”，而把革命的一面则尽可能地掩藏起来。在英国，新闻更为集中化，公众更容易受到欺骗，人们只知道有两种西班牙战争的说法：右

翼称之为基督教爱国者与嗜血的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左翼称之为温和派共和人士对军事叛乱的镇压，而核心问题则被成功地掩藏起来。

这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支持法西斯的新闻媒体散布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的谎言，而善意的宣传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否认西班牙“赤化”是在帮助西班牙政府。但主要的原因是：除了各国的一些小规模革命团体外，整个世界都在下决心阻止西班牙革命。西班牙共产党尤其是这样，它仰仗苏联的支持，全力反对进行革命。这些共产党人的理论是，在这个阶段进行革命必将产生致命的后果，在西班牙要做的不是由工人来控制，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特别需要指出“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持有这种观点。外国资本在西班牙有着大量的投资。例如，巴塞罗那运输公司就有上千万的英国资本，而工会却控制了加泰罗尼亚的所有交通。如果革命继续推进的话，将不会给予外国资本以任何补偿，即使给予，也少得可怜；如果资产阶级共和派占上风，则将能够保证外国投资的安全。既然革命要被粉碎，事情就大为简化，好像什么革命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每个事件的实质意义就可以被掩藏起来，权力从工会向中央政府的每次转移都以军事重组的必要宣传出来。最后产生的结果非常奇特。在西班牙境外，几乎没有人知道那里发生了革命，而在西班牙境内，则没有人怀疑那里发生了革命。即使处在共产党人控制之下的、或多或少地执行反对革命的政策 PSUC 的报纸，也都在谈论“我们的光荣革命”。与此同时，外国共产党人的新闻媒体则在高喊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革命的迹象，并没有发生夺取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之类的事件；或者，即使发生了，也“不具有任何政治上的意义”。用 1936 年 8 月 6 日《工人日报》的话来说，只有那些彻头彻尾颠倒黑白的人才会说西班牙人正在进行社会革命，或者说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外的任何革命。相反，胡安·洛佩兹，一位巴伦西亚政府的成员，在 1937 年 2 月宣称，“西班牙人正在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为了民主共和国和宪法文本，而是为了……革命。”如此看来，那些所谓彻头彻尾颠倒黑白的人也包括政府官员，而我们正是为政府而战的。一些外国反法西斯报纸甚至附和这类可怜巴

巴的谎言，佯称教堂只是在被法西斯占为堡垒时才会受到攻击。事实上，各类的教堂遭受破坏乃是势在必然，因为人们知道西班牙教堂是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西班牙的六个月中，我只见到过两座未受破坏的教堂，除了马德里的一两座新教教堂外，其他教堂直到1937年7月才被允许重新开放和举行仪式。

但是，这只是革命的开始而非终结。工人，自然是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可能还有其他地方的工人，即使有能力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去推翻或完全取代政府。他们显然不能这样做，因为佛朗哥尚在门前叫战，相当一部分中间阶层还依附在他们那边。国家处于转型状态，要么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要么回到往常的资本主义共和。农民占据了绝大部分土地，他们想保住这些土地，除非佛朗哥获胜而被夺走。所有的大工业都已经被集体化了，但是继续保留集体化、还是重新引入资本主义，最终要看哪一方获胜。起初，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都可以明确声称代表工人阶级。中央政府由左翼社会主义者卡巴列罗领导，包括代表劳工总会 UGT（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和 CNT（安那祺主义者控制的工团主义联盟）的部长。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实际上一度被主要由工会代表组成的反法西斯防务委员会（代表按比例从各组织成员中选出，九名代表工会，三名代表加泰罗尼亚自由党，两名代表各种马克思主义政党（POUM、西班牙共产党等））取代。后来，防务委员会解散，自治政府重组，以便代表工会和各种左翼政党。但随后政府的每次改组都是向右翼方向发展。首先是 POUM 被清除出自治政府，六个月后卡巴列罗被右翼社会主义者罗格林取代，不久 CNT 被挤出中央政府，然后是 UGT，接着是 CNT 被自治政府推出门外，最后，战争和革命爆发一年以后，政府完全由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人士和共产党人组成。

全面右转开始于 1936 年 10 到 11 月，这时苏联开始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权力从安那祺主义者手中转到共产党人手中。除了苏联和墨西哥，其他国家都没有诚意来挽救共和国政府。墨西哥显然不能大量提供武器，苏联相应地处于支配地位。……苏联提供的武器源源

而至，共产党及其盟党却甚少将其交给他们的政治对手（这就是为什么在阿拉贡前线几乎没有苏联武器的原因，那里的部队主要是安那祺主义主义者。直到 1937 年 4 月，我所见到的唯一的苏联武器，除了飞机（可能是苏联生产的，也可能不是）就是一挺冲锋枪）。……战争基本上是一场三角斗争。与弗朗哥的战斗仍在继续，但政府的另一个目标却是夺回工会手中掌握的权力。……安那祺主义者是唯一举足轻重的革命派别，却被迫一步一步地后退。集体化进程受到压制，地方委员会被废除，工人巡逻被禁止，战前的警察队伍被恢复并被迅速扩充、添加装备，工会控制的各种主要工业部门被政府接管（占领巴塞罗那电话局，并由此引发五月战斗，就是其间发生的事件）。最后，最重要的是，工会组织的民兵渐渐被解散，并被改编到新建的大众军这个半资产阶级阵线的“非政治化”、有不同工资级别、不同特权军阶的军队，等等。在特定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步骤。不过这在加泰罗尼亚要比其他地方发生得晚，因为那里的革命团体最为强大。显然，工人想要确保他们的胜利，唯一的办法是保持部分自己控制的武装。通常，解散民兵是以提高军事效率的名义来进行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需要进行彻底的军事重组。其实，民兵组织完全可以在工会的直接控制之下进行改编，并提高他们的效率。但实行重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安那祺主义者继续拥有自己的军队。况且，民兵组织中的民主精神极易使之成为革命思想的温床。……

这种联合被称作“大众阵线”，基本上是敌对派别之间的联合，它似乎总是以一方吃掉另一方而告结束。在政府的各个派别之中，共产党人不代表极左派，而是代表极右派，这是西班牙局势唯一出人意料的地方，在西班牙之外的国家产生了很多误解。……

大致说来，CNT-FAI 主张：（1）让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来直接控制工业，如交通、纺织等；（2）由地方委员会来掌管政府，抵制各种形式的中央集权主义；（3）对资产阶级和教会采取不妥协的敌对态度。最后一点虽然最不准确，却最为重要。安那祺主义者反对大

多数所谓的革命，虽然他们的原则很模糊，但他们真切地痛恨特权和不公正。从哲学上来看，共产主义和安那祺主义截然相反。实际上，在追求的社会形式方面，差别主要是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完全无法调和。共产党人总是强调中央集权和效率，安那祺主义者则强调自由和平等。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根深蒂固，在苏联的影响减弱时，可能超过共产主义。在战争的最初两个月，正是安那祺主义者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力挽狂澜。尽管既无组织也无纪律，安那祺主义的民兵却仍以西班牙部队的最佳战士而著称。……

……“战争第一，革命其次”是一个再三出现的口号，普通的PSUC民兵虔诚地相信这一口号。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打赢战争之后革命会继续下去。这个口号只是一句空话。共产党人努力争取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延到更适宜的时候，而是确保它永不发生。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权力越来越远离工人阶级的控制，随着越来越多各阶层革命人士被投进监狱，事情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每一项变动都是以军事需要为名来进行的，因为这个借口是现成的，而结果总是把工人从有利位置上赶走，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抵制重新引入的资本主义制度。……

我已经描述了我们在阿拉贡前线是如何被武装、或者说不被武装的情形。几乎不用怀疑，武器被蓄意收回，以免过多的武器流入安那祺主义者手中，因为他们日后会把这些武器用于革命目的。从阿拉贡发起的强大攻势，本来可以迫使佛朗哥从毕尔巴鄂甚至从马德里后退，结果却根本没有发生。相对而言，这也许只是一桩小事。更重要的是，一旦战争被狭义地理解为“争取民主的战争”，那就难以吸引国外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支援。如果直面这一个事实，我们就必须承认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对西班牙战争认识不一。尽管已有数万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战斗，但在他们的身后更有千百万人无动于衷。……

为什么摩洛哥没有发生起义？佛朗哥正在企图建立声名狼藉的独裁制度，而摩洛哥人宁可接受佛朗哥的统治，也不愿接受大众阵线政

府！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人在摩洛哥发动起义，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把革命置于战争之上。为了让摩洛哥人相信政府这边的诚意，最重要的就是宣布他们的自由。

## 第 6 章

这一地区的西班牙人很可能确实没有正统观念的宗教信仰。我在西班牙没有看到任何人划过十字，这令人感到奇怪。你也许会认为这个动作出自本能，不管革命还是不革命。很明显，西班牙的教会还会卷土重来（就像谚语说的，夜晚和耶稣会士总是会回来的），但毫无疑问，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教会已经崩溃和瓦解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连处于类似境地的垂死的英国教会也不相信。对西班牙人民来说，至少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教堂正不折不扣地面临着严峻考验。基督教的信仰很可能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安那祺主义取代了，安那祺主义的影响广泛传播，安那祺主义本身无疑带有某种宗教意味。

## 第 8 章

以工会为基础并由政治观点相近的人组成的工人民兵，有效地开拓形成这个国家中最具革命精神的用武之地。我或多或少偶然地来到这个所有西欧社会中无论规模大小都是唯一的政治意识和敌视资本主义更普及的社团。在阿拉贡这个地方，每个人置身于数万主要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群中，大家都生活在同等水平并信奉平等的原则。大家在理论上完全平等，实际上也差不了多少。这里人们预先体验到了社会主义的滋味，这里我是指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精神氛围。许多文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行为——势利、压榨钱财、惧怕老板等等都已不复存在。森严的社会阶级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消失，这在充满铜臭气的英国几乎不可想象。这儿只有农民和我们自己，没有人由别人来主宰。当然，这样的事态不会长久持续。它只是世界大拼杀的一个暂

时的局部过程。但是，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毕竟对亲身经历过的人们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无论当时如何咒骂，事后人们却发现自己与某种奇怪的、有价值的东西联系起来。人们相处在希望代替冷漠或玩世不恭的社团，“同志”一词代表着友谊，不像在许多国家里那样代表着欺骗。人人都呼吸到了平等的空气。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时下正流行否定社会主义与平等有任何关系。在世界各国都有政党雇佣的一大批帮闲文人和时髦的教授小人，忙于“证明”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是没有触动掠夺动机的计划性国家资本主义。幸运的是也有与此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点存在。真正吸引着普通人投身社会主义、使他们愿意为“社会主义的神秘性”而甘冒生命危险的，正是平等这个理念。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否则就什么也不是。正是这一点是我在民兵部队的那几个月很有价值。西班牙民兵部队只要存在着，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缩影。在那个集体中，没有人热衷于追名逐利，虽然每样东西都短缺，但没有特权和巴结，人人都能粗略地尝到可能像社会主义起始阶段的滋味。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看到一个比以前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建立。这部分也是由于我有幸置身于西班牙人中。他们与生俱来的高雅和无时不在的安那祺主义特质，如果把握好机会，一定能在初始阶段就创造出宽容的社会主义。

## 第9章

战争期间，每一个在相隔几个月来到巴塞罗那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觉察到了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惊诧的是，不管他们是先在八月、后在一月来的，还是和我一样先在十二月、后在四月到的，大家议论的就是一件事：革命气氛已经消失。无疑，对于在八月当街道上的血还未干掉、民兵驻进小旅馆时去过那里的人来说，到了十二月，巴塞罗那已经变得好象是资产阶级的了。但是，对于我这样刚从英国

来的人来说，它却比我事先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都更像是一座工人的城市。现在，高潮已经退去。巴塞罗那再次成为普通的城市，因战争而多少有些凋敝和破败，但不再有工人阶级占优势的明显迹象。

.....战争仅进行大约六个月，政府就不得不采用征兵手段，如果这是对外战争，采用这种办法也许尚在情理之中，但在内战中这么做就似乎太不正常了。这无疑与人们对战争偏离最初的革命期待深感失望密切相关。那些自发组成民兵队伍的工会成员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把法西斯赶回萨拉戈萨，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工人阶级控制而战。但是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显——工人阶级失去了控制。.....有政治头脑的人更关注安那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两败俱伤的斗争，而不是与佛朗哥的战斗。

.....在城市的奢华和不断出现的贫困、街道上的虚假繁荣，包括花店、彩旗、宣传海报和拥挤的人群等等的表象下面，存在着一种明显和可怕的政治敌对和憎恨。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不无胆颤心惊地预感：“快有麻烦了。”眼前的危险，既简单又不难理解，其实就是那些希望革命深入和希望革命停止或避免的人们，最终是安那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抗。政治上，除了 **PSUC** 和他们的自由派同盟外，加泰罗尼亚没有其他力量了。但是，**CNT** 有难以轻视的力量，他们虽然缺乏精良的装备，对自己想要什么不如对手明确，但人数众多，在许多重要行业占有优势。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注定会出麻烦。在 **PSUC** 控制的自治政府看来，要保证自己的地位，首要的是必须从 **CNT** 工人的手中夺取武器。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那样，瓦解政党民兵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安排。同时，战前的武装警察、地方卫队（**civil guards**，相当于治安警察）等等，已经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加强和装备。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特别是，地方卫队属于那种欧洲大陆型的佣兵，他们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忠实地充当了有产阶级的保镖。自治政府同时发布一条命令，凡私人武器一定要上缴。这项命令自然没有得到遵从，很清楚，只能通过武力才能从安那祺主义者手里夺取武器。这样一来，由于新闻检查制度，对遍及加泰



罗尼亚的各种冲突，总是流传着含糊不清、相互矛盾的谣言。在许多地方，武装警察对安那祺主义者控制的重要地点发动攻击。在靠近法国边界上的普奇达，一帮骑兵被派去占领了先前由安那祺主义者控制的海关，著名的安那祺主义者安东尼奥·马丁被杀害。我想，类似的事件在费卡洛斯和塔拉戈纳也都发生过。在巴塞罗那工人阶级郊区，也曾有过一系列不那么过分激烈的争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CNT 和 UGT 的成员接二连三地互相遭到谋杀，随谋杀而来的是盛大的、蓄意煽动政治仇恨的葬礼。……

“五·一”节就要到了，CNT 和 UGT 都在筹划参加大游行的事。CNT 的领导人比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要更为温和，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同 UGT 实现和解。的确，他们的政策主张是试图把两大联盟合并为一个更大的联盟。CNT 的想法是应该和 UGT 一起游行并显示他们的团结。但到最后一刻，游行被取消了。非常清楚，游行只会引起暴乱。因此，5 月 1 日这一天平静无事。这的确是一件怪事。巴塞罗那，这个号称革命的城市，也许是唯一一个在那一天没有举行庆祝活动的非法西斯的欧洲城市。但是，我承认，我反而松了一口气。

## 第 10 章

大约在 5 月 3 日中午，一位朋友在经过旅馆时嘴里冒出了一句话：“我听说电话局出事了。”由于某种原因，我当时并没怎么在意这句话。

……星期二，安那祺主义《团结报》把电话局遭到攻击称之为“巨大的挑衅”（或类似字眼），但到了星期三，报纸就变了调子，开始恳求人们回去上班。安那祺主义者的领导人也发出了同样的信息。POUM 的报纸《战斗》的办公室，大约在电话局遭到袭击的同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地方卫队的袭击和占领。但报纸仍在别的地址印刷并被分发出去，催促大家尽可能待在街垒里。人们惴惴不安、忧心忡忡，谁都知道事件究竟将如何了结。我怀疑到人们是否都离开

了街垒，但人们都厌恶这种毫无意义的战斗，它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因为没有人想把它发展为一场新的大规模内部战斗，那只能意味着掉转反对佛朗哥的战斗。这种担心在各方面都有所表现。广大 CNT 成员的最初和一贯的要求只有两个：交还电话局和解除可恨的地方卫队的武装。如果自治政府答应做这两件事，并答应终止牟取食品暴利的行为，那么毫无疑问街垒会在两小时后全部拆除。但自治政府显然没有打算作出让步。……

第二天，巴伦西亚突击队的士兵到处出现，他们有如征服者般地迈步大街小巷。这无疑是中央政府在炫耀武力，目的在于吓唬政府自己也明知不会反抗的居民。假如担心发生新的暴动，他们就会待在街垒里，而不会一小股一小股的分散在大街上。他们是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华丽的军队，虽然我在某种意义上假定他们是“敌人”，我仍禁不住喜欢上他们的外表。但我用一种惊奇的目光在看着他们来回溜达。在阿拉贡前线，我见惯了衣衫褴褛、几乎没有装备的民兵，却不知道共和派还拥有一支这样的军队。他们不仅在身材上经过严格挑选，更使我吃惊的是他们的武器。他们全都装备了崭新的“俄式来复枪”（这些枪是苏联运给西班牙的，但我却相信那是美国制造的）。我察看过其中一支来复枪。它虽不是那么完美，但比起我们在前线用的那种糟糕透顶的老式大口径来复枪，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他们每十个士兵拥有一挺冲锋枪，每人拥有一支自动手枪，在前线，我们 50 人才可能有一挺机关枪，而手枪只能非法购买。事实上，我现在才注意到，到处都一样：不上前线的突击队和马枪骑兵们的装备比我们好，穿戴更棒。我猜想，大概在所有战争中都是一样的——后方着装时髦的警察和前线衣衫褴褛的士兵之间，总是存在着明显差别。……

巴塞罗那的战斗，给巴伦西亚政府提供了渴望已久的全面控制加泰罗尼亚的借口。工人民兵将被解散，重新编入大众军。

## 第 11 章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整个加泰罗尼亚的局势都很紧张。在这本书的前几章里，我已经描述了共产党人和安那祺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事态发展到 1937 年 5 月，暴力似乎已经无法避免。造成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命令上缴所有的武器，并决定以此建立一支不允许工会会员加入的“非政治的”武装警察部队。这样做的意图很清楚。同时很明显，下一步行动就是接管由 CNT 控制的关键性的工业部门。此外，由于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以及感到革命已经受挫的普遍模糊感觉，在工人阶级中间产生了相当的怨恨情绪。这样，5 月 1 日没有发生骚乱，许多人感到惊喜。5 月 3 日，政府决定接管电话局。这里自战争爆发以来一直主要由 CNT 的工人管理。据称，电话局管理得很糟糕，官方的电话被窃听。警察局长萨拉斯（不清楚他是否越权执行了命令）派了三卡车的武装地方卫队占领电话大楼，而携带武器的便衣警察则封锁了大楼附近的街道。大约在同一时间，卫队还占领和控制了市内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各种建筑物。无论这些行动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人们普遍相信，这是卫队和 PSUC（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向 CNT 发起总攻的信号。到处传言说工人们的建筑物遭到了袭击，武装的安那祺主义者出现在大街上，人们不再工作，战斗很快就会打响。当晚以及第二天早上，全城到处建起了街垒，但直到 5 月 6 日早晨才发生战斗。然而，双方进行的主要是防御性的战斗。建筑物虽然遭到包围，但据我所知，并没有受到进攻，也没有使用大炮。大体说来，CNT-FAI 和 POUM 控制了工人阶级聚居的市区，武装警察和 PSUC 则占据了城市中心地带和各政府机关。5 月 6 日，双方曾有短暂的休战，但可能由于卫队急切地想要解除 CNT 工人的武装，冲突很快重新爆发了。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开始主动撤离街垒。5 月 5 日晚间前后，CNT 曾占上风，大批卫队的士兵投降。但 CNT 没有公认的领袖，也没有固定的计划。事实上，人们也能看得出来，除了抵抗卫队的模糊决心，根本就没有任何计划。CNT 的政府领导人与 UGT 的领导人一起，恳求每个人都回到工作岗位上，毕竟，这是食物日益短缺的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继续战斗，谁也不知道究竟将会发生什么。5 月 7 日下午，局势基本恢复正常。那天傍

晚，6千名来自巴伦西亚的突击队由海路抵达巴塞罗那，控制了整个城市。政府发布命令，要求除了正规军所持有的武器外，其他所有人的武器都必须上缴。在随后的几天里，政府收缴了大量的武器。……

这场战斗为巴伦西亚当局直接控制加泰罗尼亚提供了借口，加快了民兵的瓦解。……真正的问题是，走上街头的 CNT 工人通过这场战斗，是否得到了或失去了些什么。我认为，当然纯粹是猜测，他们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占领巴塞罗那电话大楼只是相当长的计划中的一个事件。自去年起，工联主义者已经逐渐失去了直接的权力，总体运动也脱离了工人阶级的控制而渐为集权领导层所左右，引向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可能重新引入私人资本主义。人们的抗拒可能使这一进程放缓。战争爆发一年后，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失去了大部分的权力，但他们的处境仍相对有利。面对无论什么样的挑衅，如果他们明确地流露出他们不会斗争，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有时候，即使被打败了，拿起武器但总比放弃斗争要好得多。

……在安那祺主义者一方，他们的行动几乎是自发性的，因为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主要是普通民众。当人们走上街头以后，他们的政治领袖才极不情愿地跟了上去，或者根本就没有卷入其中。……CNT 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否认整个事件。这有许多方面的理由。首先，CNT 仍在中央政府和自治政府中有自己的官员，使它的领导人比一般成员更保守。其次，CNT 领导人的主要目标是与 UGT 结成联盟，而冲突只会加剧 CNT 和 UGT 之间的裂痕，至少当时是这样的。第三，虽然当时不为人所知，安那祺主义的领导人担心事态的发展如果越过了某个界限，工人占领整个巴塞罗那，正如他们可能在 5 月 5 日所做的那样，那就有可能引发外国的干涉。……

CNT 领导人并没有从更谨慎的态度中得到太多好处，他们的忠诚受到称赞，但机会一到，中央政府和自治政府就将他们踢出门外了。

……安那祺主义者清楚地知道，即便他们放下武器，加泰罗尼亚的主要政治力量 **PSUC** 仍会把武器留在手中。战斗结束后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其间，在街上看得到大量的武器。虽然这些武器在前线很受欢迎，但最终却留在了后方“非政治的”警察手中。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共产党人和安那祺主义者之间仍有不可调和的分歧，迟早都必然会导致某种斗争。自战争开始以来，共产党的人数激增，他们夺取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国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来到西班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公开表示，一旦反对弗朗哥的斗争取得胜利，就会“清算”安那祺主义。在这样的境况下，人们很难期待安那祺主义者会愿意交出他们在 1936 年夏天夺到的武器。

占领电话局仅仅是点燃既有炸弹的导火索。也许恰好可以预料的是，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认为不会有麻烦。据说，几天前，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总统孔帕尼斯笑着宣布，安那祺主义者会忍气吞声的（《新政治家》1937 年 5 月 14 日）。但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决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共产党人和安那祺主义者在西班牙各地发生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在加泰罗尼亚，特别是其首府巴塞罗那，局势日趋紧张，已经发展成街头争吵、谋杀，等等。突然间，全城的报纸都在报道武器分子正在进攻工人在七月战斗中夺取的、对他们来说感情上极为敏感的建筑。我们必须记住，工人阶级并不喜欢地方卫队。对过去的数代人来说，卫队是领主和老板的保镖，而地方卫队遭受到加倍的仇恨，因为人们纷纷猜测，而且有充分的根据，他们对法西斯的反对十分可疑（战争一爆发，地方卫队就与更有势力的党派站在了一边。在后来的战争中，在好几个地方，例如在桑坦德，当地的卫队全都转向了法西斯势力）。促使人们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走上街头的情感，可能就是促使他们在战争之初抵抗叛乱将军的同样情感。…（政府占领电话局）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必定会导致一场冲突。这是一种挑衅性行为，是一种威胁性的姿态，意思是说：“你们的权力终止了，由我们来接管。”以为人们不会反抗，违背了基本常识。

(摘录完)

[译者李华，刘锦春，赵京 2013 年 11 月 19 日校改]